



中国社会出版社
谢泳 · 著

储安平与《观察》



储安平与《观察》

《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费孝通·1985年

储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落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冯英子·1994年

ISBN 7-5087-0701-X



9 787508 707013 >

ISBN 7-5087-0701-X/K·132

定价：25元





修正文库

储安平与《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储安平与《观察》/谢泳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9

ISBN 7-5087-0701-X

I. 储... II. 谢... III. 储安平(1909~1966)—评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836 号

书 名: 储安平与《观察》

作 者: 谢 泳

责任编辑: 张殿清

封面设计: 长卿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 编: 100032

电 话: 6606820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701-X/K·132

定 价: 25 元

目 录

第一章 储安平的一生	1
第一节 早年储安平	1
第二节 光华大学	3
第三节 早年的文学活动	5
第四节 在湘西	12
第五节 在重庆	15
第六节 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19
第七节 《观察》时期	22
第八节 在复旦	30
第九节 储安平受到的两次批评	32
第十节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33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	44
第十二节 储安平在 1957 年	54
第十三节 储安平和梁漱溟	57
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	60
第二章 《观察》的主要活动	65
第一节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	65
第二节 “《观察》丛书”的情况	71
第三节 《观察》与学潮	73
第四节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	78
第三章 《观察》的两次论争	85
第一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	85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94

目 录

第四章 《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	109
第一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	109
第二节 《新路》与《观察》	114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	123
第四节 《观察》的言论与四十年代大学教授	128
第五节 《观察》的复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	135
第五章 《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139
第一节 关于“《观察》撰稿人”	139
第二节 储安平、徐铸成的交往	143
第三节 《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146
第四节 《观察》撰稿人简况	150
附录一	
《客观》1~17期目录	157
附录二	
《观察》1~6卷作者索引	185
储安平著作单行本目录	214
批判储安平言论专集目录	215
主要参考文献	216
后 记	218

第一章

储安平的一生

第一节 早年储安平

关于储安平，现在能知道的材料不是很多，特别是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的至多是一些间接的传说，而没有什么文字材料，笔者曾和他的四个子女有过通信联系，但关于他父亲早年的生活，他们也所知甚少，笔者也曾专门访问过他的女儿储望瑞女士，她也知道的不多。储安平的档案今天的研究者还看不到，根据他1949年后工作的变化，可以从四个地方去寻访储安平的档案，即中国民盟、九三学社、中国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社，因为他曾在这四个单位供职，有可能留下有关的历史资料。

在目前接触到的有关储安平的历史资料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乎没有他自己写的自传性文字，1949年以后，储安平并没有停止写作，但他对于自己的生平很少提起。想给储安平先生写传记的人很多，但正是由于没有资料，所以至今还见不到较为完整的储安平传记。^①



储安平

^① 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南京。邓加荣：《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北京。这是1957年以后最早从正面叙述储安平历史经历的作品。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储家是宜兴的望族。对于他的家世，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还是储安平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题目是《母亲》。^①

储安平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生下来了六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

这是储安平一篇自叙性的散文，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这是一篇有关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于用了很强的抒情笔调，人们不大留意他所叙述的真实家世，而多数为他忧郁的笔调所吸引，但从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储安平早年的生活情况，再结合他后来的一些生活，可以判定这是一篇真实的文字而不是虚构的。他说：“我父亲，爱赌也爱嫖。——还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他家人们所疼爱。在那样异样疼爱的祖母之抚育下，我健壮地生长着，一直到14岁上我祖母死去的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十四年，非常疼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亲之外的另外一种爱。”

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知道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储南强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县令，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50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储南强1959年去世。

储安平从小是在一个特殊家庭中长大的，对于他的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他的女儿曾告诉我说：“父亲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对他的伯父非常敬重。储安平的成长与后来读书，都得到过储南强的帮助。他读小学和中学都是伯父给钱，去英国留学，伯父也为他在江苏教育厅申请到二千元官费。据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游览善卷洞时，看见储安平智慧出众，曾大为夸奖。

《母亲》是1930年夏天写的，当时储安平21岁。他说：“祖母和父亲，在我14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

^① 《真美善》杂志7卷1号，第101页，上海。

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般的我。”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性,由于幼失怙恃,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耐劳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叶圣陶日记中有一则储安平请客的记载,可见出储安平的风格:“储安平请客单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将新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观察》销数到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种周刊矣。”^①

许多接触过储安平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生活有关。

第二节 光华大学

对今天的人来说,光华大学已是很陌生了,但在过去它是很有名



上图:光华大学校门

左图:光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张寿镛

① 《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7页,北京。

气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它的几个学院被拆散到了其他大学,要是不很严格地看,可以说今天上海华东师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而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大学,他的校长是张寿镛,文学院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他曾任职的教授阵容是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胡适之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



三十年代的储安平

《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

储安平是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的,这个入学的现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

他在光华读的是什么专业。戴晴说：“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①

陈子善认为“1928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②

而赵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是我在光华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③赵家璧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是同班同学来看，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储安平的英文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赵家璧还在文章中引述了他1935年北上组稿的日记，在5月29日至3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途经南京时和老同学储安平见面的详细情况，他们还一起去看望了当时在南京的小说家张天翼。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赵对储的评价，说储“反右斗争开始，被错划为右派。据说文革期间已逝世”。

第三节 早年的文学活动

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④

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查阅《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

① 《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第132页。

② 《文汇报书周报》1994年6月4日10版。

③ 《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111页。

④ 《鲁迅全集》第14卷第7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



《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封面

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

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①，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的文学活动只可以说是早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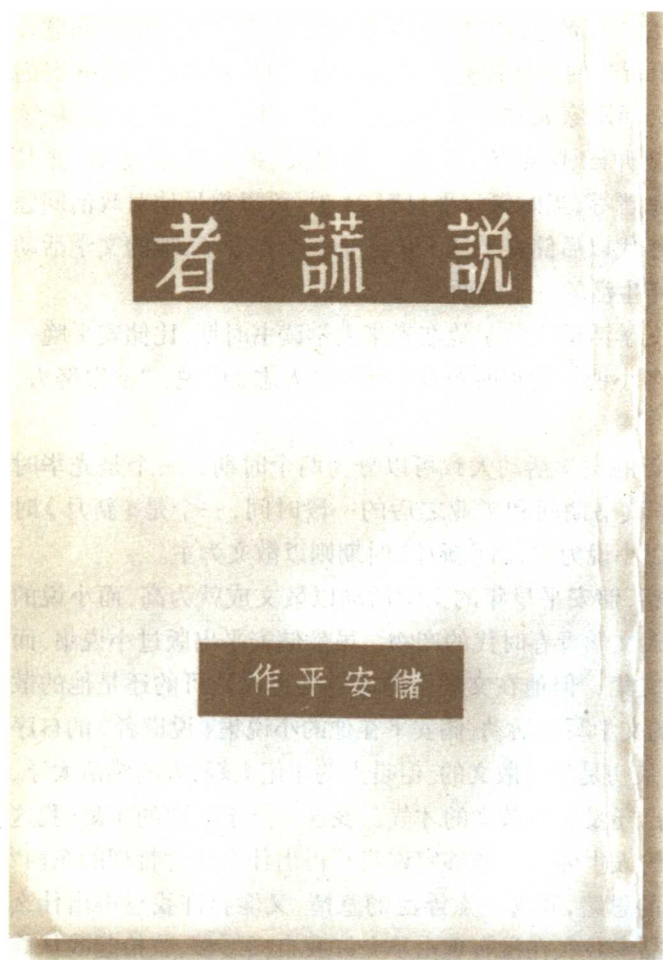
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光华时期，即他在光华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是《新月》时期。光华时期以小说为主，而《新月》时期则以散文为主。

总体上观察，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以散文成就为高，而小说的写作只是一个人文学青春时代的产物。虽然储安平出版过小说集，而没有出版过散文集，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为世人认可的还是他的散文。关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储安平在他的小说集《说谎者》的自序中曾说过：“我最初是学习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纪太轻，人的感情太浮，这使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许我写得出什么郁葱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惭形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③

① 《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新月书店，1931年，上海。

② 《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4日10版。

③ 《说谎者》影印本第1页，良友出版公司，1992年，上海。



《说谎者》封面

储安平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那时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说要难，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散文的地位好像要高于小说。他最初写小说在1931年春天，他写了一篇名为《春》的小说，1932年的春天他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对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1934年的四年时间中，他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储安平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的这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新月》时期储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几乎所有评论《新月》散文创作或者编选《新月》散文作品时，储安平的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写作上，储安平可以说是《新月》的后起之秀，1984年，梁实秋和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就选了储安平的三篇散文，徐志

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散文大家也不过每人选了四篇,可见对储安平散文的推重。储安平的散文很讲究辞藻,抒情的味道较重,深受徐志摩散文的影响,他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的悼文《悼志摩先生》中就说过:“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①(《新月》第4卷,第1期)对于储安平的散文,一位研究者曾做出过这样的分析:

储安平的散文那么诗意葱茏,也应他深挚地领悟到了生命就像“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的这篇题目《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的散文,以缪塞那种“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式的语气抒述着从人生的流处知和悟解到的愁绪和苦况:因为“太聪明”,“感受力”太强,便深深地体验到“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的“痛楚”;但他写散文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在这种人生况味中所感悟到的忧郁之美:“人生就是那样的 Sentimental……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正是这种感伤和忧郁的甜蜜使得他虽备尝人生愁苦却又惑恋着人生。《在豁蒙楼暮色》一文中,储安平更以一种灿烂的诗思表述了这种绅士的悟美感恋心性:他从南京的鸡鸣寺看到了“幻想中”的海光暮色,湖面被远山背后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缕美丽的夕光便能补偿黑暗天地所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种意蕴都能被那清新的惨白之美包容无疑。^②

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

① 《新月》第4卷第1期。

② 朱寿桐:《以感美感恋心态走出名士传统——新月派散文的绅士文化特性考察》,《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北京。

純文藝月刊

文學時代

儲安平編

今後中國新文學的方向
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
在一個遠遠的世界裏

中秋
政變
詩

辛

且平

秋交

皆評

勞倫斯詩一首

論蘇俄新舊文學的精神及其演變

列車

今年的秋

快遞生活症

夫婦之間

編輯後記

張沅長

老舍

方令孺

張天翼

陳銓

孫聖棠

董華辨

沈聖華

孫海侯

陳夢家

高昌南譯

老白

林庚

由稚吾

邵洵美譯

儲安平

創刊號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

《文學時代》創刊號

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1935年11月,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杂志《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其时储安平大学刚毕业,时年26岁。《文学时代》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常在上面写文章的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可见储安平在编辑方面的才干。储安平在1936年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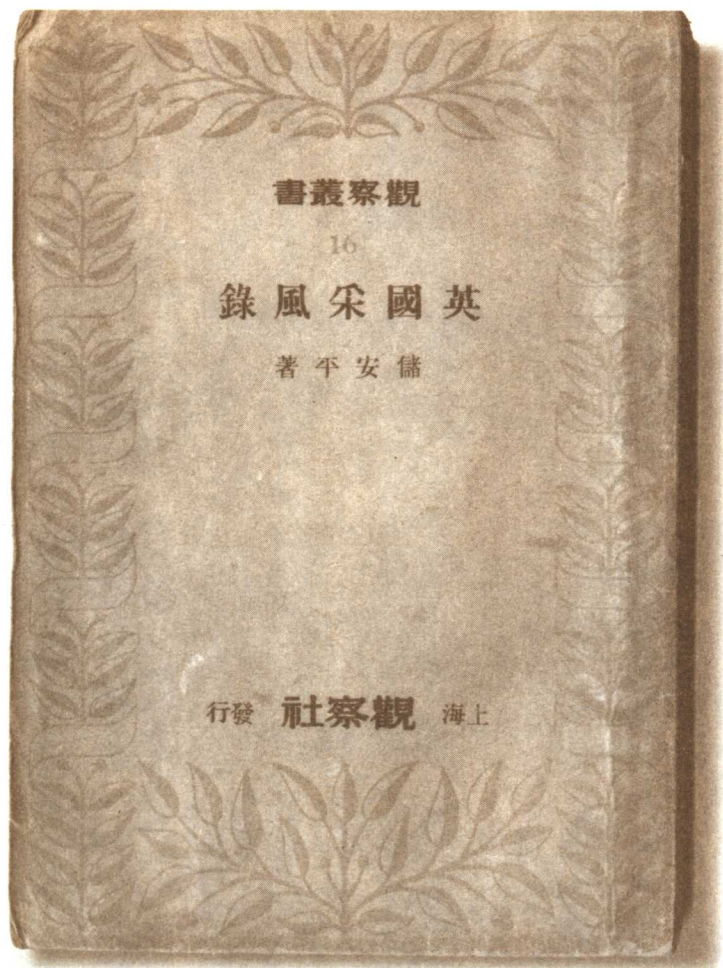
储安平曾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

储安平后来一度做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抗战军兴,随报馆迁往长沙。曾和冯英子先生一起在《中国晨报》共事。

第四节 在湘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

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



《英国采风录》封面



《英人·法人·中国人》封面

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其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强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十章。”

在这之前，他还在俞颂华做总编辑的科学书店出版了一本根据他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①

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 32 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第五节 在重庆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有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 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②

^① 《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第 139 页。

^② 陈纪滢：《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 102 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年，台北。

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①

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②

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则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储君，一位是大刚报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倾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③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

① 《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3页。

② 《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③ 《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第62页，成文出版社，1991年，台北。

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①

《客观》周刊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

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②

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③

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

① 《观察》第1卷第1期第23页。

②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济南。

③ 《客观》第12期第12页。

物。他说过：“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①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9月1日出版”。^②

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

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前12期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6期为吴世昌撰稿）。

① 《客观》第1期第1页。

② 《上海文化》第8期第25页，上海文化服务社，1946年，上海。

第六节 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充分表明了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

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①

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②

① 《客观》第1期第2页。

② 《客观》第2期第1页。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一

Editorial Board
 Prof. Chu Anping
 Editor-in-Chief,
 Prof. Cheng I-chiang
 Prof. Chen Wei-min
 Prof. Chen Chia-hsiu
 Mr. Su Hsiang-shan
 Prof. Wu Chih-shiang
 Managing Editor
 Mr. Chang Chih-shing

觀客

中興路在設館設刊社

THE OBSERVER

美國共會談紀要
 遠東三十年
 論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之設立
 美國之樂觀主義與歐洲的悲觀主義
 文學、藝術、音樂、戲劇
 張大千與中國繪畫
 約翰·曼羅維爾士的遊記
 英國木風錄(未完)

王后
 現代中國工建人物
 錢子寧
 各地通信

錦城三秋
 經濟一週
 物價的回落(金融市場)

副刊
 命合生何欣
 李約京
 李向哲
 李向哲

欄珊
 環環環在來
 譚國華
 北平何
 北平何
 北平何

熱料紙國幣一百元
 台幣國幣一百五十元
 本報社址：重慶江門大街九號
 上海分社：上海南京路一二五號九七號
 南京分社：南京路十號

我們的立場
 第二不諱
 一週
 一週刊
 用人
 組織與力量
 關山
 國家的活力
 美國人和中國官
 本社同人

儲安平
 郭有守
 余敬
 柳鶯
 徐盈
 儲安小
 張德昌
 錢濟廉
 陳維發

《客观》创刊号封面

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有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

在《客观》时期，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它的长处，但也有的它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于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

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它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用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它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①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① 《客观》第4期第1页。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也很引人注目。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①

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他过分早熟的自由与民主的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的言论行为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第七节 《观察》时期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

^① 《客观》第12期第1页。

觀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九日 星期五 第六期星

四版

創刊號



創刊號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專論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二十一國和會

論知行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非成頓通信

糧食的國際分配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

李聞之死 (昆明通信)

沉默中的潘光旦 (南京通信)

山水：人物·藝術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卞之琳

撰稿人

撰稿人

《观察》创刊号封面

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与的价值和作用。

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①从储安平的叙述中能够大致想像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

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

① 《观察》第1卷第1期第24页

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

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①

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②

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像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

① 《新观察》35周年纪念册。

② 《编辑记者100百人》第41页,学林出版社,上海。

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得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得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半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①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168页,中华书局,1979年,香港。

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僭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筹，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

储安平信五通

通之先生

我们刻刻规定着目的，希望去国内能有一层喜面
 字用偏倚的言论，就想回字陪奉，互自由思想地
 转予，并侵扰累以外日趁此份子有一个共同语言的地
 方。我们正等候的时候，答说所上遇生七转求
 生七，回予支持，之道生七事吃，引者未能在效其
 仍的诚意，上夏 生七也回，许多朋友鼓励我晋
 福 生七，并修修未欲了味位事。因为 生七秋
 回多年，这才年中，之白是中回就之上 说作做办的心
 个时候，我们自已说这担心自问，是五之空堂学派的

观察週刊社用笺

上海福州路三十四号
电话：九〇二一九

储安平致胡适的信

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

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之前，也给傅斯年写了信，陈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国为培养自由主义而尽力的设想，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他也给过储安平不少具体的建议。储安平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国来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太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

法可设。”^①

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虽然储安平对胡适非常尊敬,但胡适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那一时期,胡适许多重要的文章常发表在一家名为《独立时论》的杂志上,可能他对于储安平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

笄移今在《大陆时期蒋经国周围的“进步人士”》中说:“我在离重庆前,写信给蒋,说我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回上海创办《观察》周刊(《观察》周刊创办人是储安平),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鲲送来两股资金。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见,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蒋经国是《观察》的股东之一。”

漆高儒对此评价说:“看笄这段文字,好像蒋经国先生是支持《观察》的,甚至送了‘两股资金’。我的看法,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初期的言论是仿效大公报式,在分类上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刊物。在最初的执笔人之中还有胡适、叶公超、傅斯年、陈之迈、沙学浚、萧公权、顾翊群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坚决反共的学人,蒋经国送点钱给《观察》,能算是‘支持者’吗?这种支持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至于后来的《观察》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把国民党说成百非而无一,已经成为中共的外围文宣单位。”^②

第八节 在复旦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

①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22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台北。

② 《中共地下党现形记》第216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台北。

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王火在《回忆储安平教授》中说:“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有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时,他仍强调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观点。此外他谈过论文应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这要依靠学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他说他办《观察》和《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是,及时反映时局。”^①

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张啸虎就是其中的一个。张啸虎1944年夏天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1948年他四年级时,被储安平邀请到《观察》杂志社工作,当时储安平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张啸虎曾写过一篇《忆储安平先生与〈观察〉周刊》的文章,他说:“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怀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

^① 《黄河》1995年第3期,山西作家协会,太原。

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①

第九节 储安平受到的两次批评

储安平在40年代末期因为创办了《观察》周刊,一时成为新闻人物,由于《观察》周刊的立场是自由主义,所以也受到了代表其他思想观点力量的批评。在那时的批评中有两次很引人注目。一次是署名土司的一篇《观察‘观察’储安平》,发表在《人物杂志三年选刊》上,一次是署名萧源的《一个〈观察〉的读者观察储安平》,发表在当时南京出版的一家名为《正论》的周刊上。这两篇文章虽然代表的立场不同,但在对储安平的批评上大体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自由主义的立场很虚伪,土司在文章中说:“‘自由分子’正同非自由分子一样,也有各式各种,但安平教授这种含混暧昧的‘自由’,作个不好听的比喻,好像是摩登太太小姐们所不离身的法宝,用来涂口红的镜子,两面皆可用,对‘高级政界’反映出一副嘴脸,对‘我们自由分子’反映出一副势态,面对于‘数以万计的读者’则仍然是好的市招。”^②

萧源则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储安平和他的《观察》纯粹是给政府添乱,他质问道:“今日储安平所得意者,以为在课堂内能够骗得几个学生对他喝彩,便认定‘民心已归’,可以纵横宇宙一下了,其实古来从事祸国殃民工作者,有几个达到了他的目的?自己以为不凡,骂张责李,究竟自己做出了几件有利民众的事?常常骂政府不能容纳异己,但在现政府之下,还可以见几个与政府主义不同的党派公开活动,通行无阻,并没有驱之于所管辖地区之外,而储安平弄了一个《观察》周刊,口虽在叫‘容纳不同意见’,‘尊重个人独立发言’,但《大公报》在自己的地盘内讲话,就遭到储安平的无情臭骂,如

① 《读书》1986年第11期149页。参阅王火:《学者张啸虎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四川《读书人报》1993年6月29日第4版。

② 《人物杂志三年选刊》第17页,上海。

果《大公报》那主笔先生不幸而参加《观察》周刊作事,储安平还不立刻撤他的职么?假如储安平为今日中国执政者,还会允许旁人有自由发言的余地?还会允许有不同自己主义的党派存在?尽管话说得如何漂亮,文章写得如何的流利,嘴如何的会讲,事实还是事实,真理还是真理,丝毫不可以蒙混”。文章甚至认为“储安平作孽的事实太多,举不胜举”。^①

《正论》在发表了萧源文章之后,还在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王萌和缪玉明的两封读者来信,以支持萧源的观点。当时的《中华时报》上也有过一篇《储安平的进步》,可惜笔者没有见到。

第十节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1929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虽然那次他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5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38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②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

① 《正论》周刊第1期第13页,南京。

② 《观察》第5卷第13期第1、2页。

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冯英子这样评价：“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①

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作出的选择）。

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40年代执著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他们有较强的学术水平，但对于政治又抱有热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热情不表现在具体直接的政治活动中，而是在道义和言论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的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差异只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应采取的方法。

《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勱、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

^① 《黄河》杂志1994年第2期第76页。

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作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

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

储安平在《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储安平在创办《观察》之前已写出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专著,从这两本介绍比较性的专著中,可看出储安平对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过深入研究的,他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上信奉英国那一套,而且在为人处事,工作作风上都明显地带有英国人办事的作风和效率。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以公平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的。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力陈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①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

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

^① 《观察》第1卷第3期第3、4页。

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储安平的《观察》时评却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很有感染力。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一事朝野多有议论,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勱》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

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治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

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

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后人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 and 苏联的态度。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分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

就是在这样对美国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与调停提出了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 and 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

过问中国的内政。”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

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

《观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所以《观察》第5卷只出了18期。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平安的寓所。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讯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份子，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减，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

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英国言，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抵，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做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

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会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些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

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一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勒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笄移今。

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

1992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铎，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埔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蒋。曾随周恩来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

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铎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讯。张今铎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铎给《观察》写军事通讯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①

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一家杂志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②

① 《上海滩》1992年第7期第44页。

② 《大学评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南京。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

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

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庚，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庚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

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期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祥的后果。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候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日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于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像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

^① 《徐铸成回忆录》第203页,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①

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

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

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

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②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困惑。《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

^① 李杜等:《常芝青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太原。

^② 《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第115页。

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①

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②

后来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500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2000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100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3000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

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

① 《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② 《碎布集》第40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

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人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

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 Independence (独立), Non-Party (无党派), The Observer (观察) 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复刊后的《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

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羨林、笄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



《玛纳斯河垦区》封面



《新疆新面貌》封面

两篇文章。

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

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

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

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

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不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①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做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

《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②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

① 《观察》第6卷第1期第4页。

② 《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

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

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

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南疆旅途见闻》。^①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②

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1956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①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98页。

②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34页。

第十二节 储安平在 1957 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8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口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很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



《储安平与“党天下”》封面

肩膀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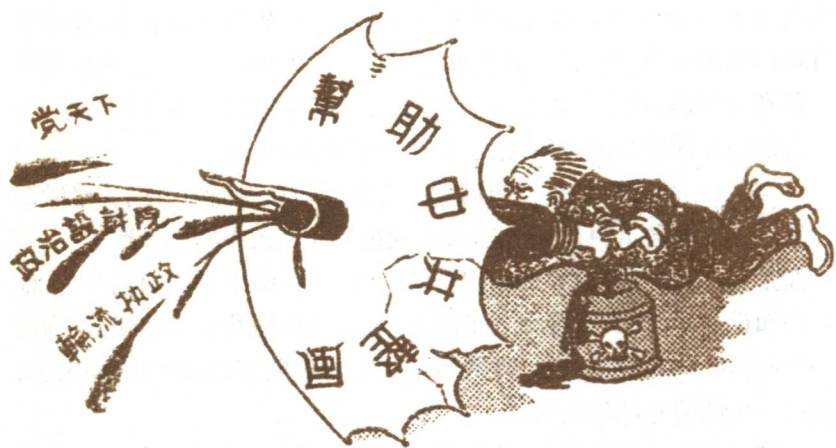
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有情绪,但又说出口。当他握笔写‘党天下’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一看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她的‘党天下’的言论的。”^①

1957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学社一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5月19日,我去看过罗隆基一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可以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

① 《光明日报四十年》第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北京。

②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期177页。



乘机出笼

1957年批判储安平的漫画

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得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第十三节 储安平和梁漱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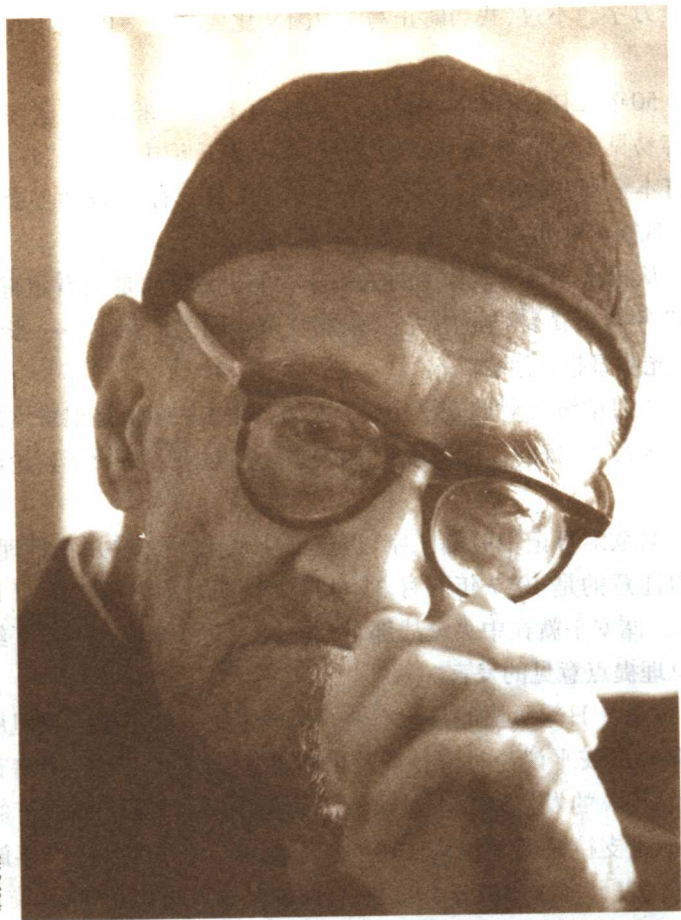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比梁漱溟小17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

的，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

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 78 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 1957 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50 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



梁漱溟

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 50 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

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写他。”^①

50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②

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月5月31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

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

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未尝不可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

①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16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北京。

② 《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3页、50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济南。

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踉踉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

父親，你在那裡？

——儲安平幼子自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寄來稿件

儲望華

儲望華先生：最近閱讀貴刊今年五月號關於家父儲安平的兩篇文章，勾起我的許多回憶。我本人是作曲家，不擅文字，對政治則因在大陸多年的生活經歷，幾乎已煙灰塵。我一九八二年獲澳洲墨爾本大學榮譽金，因而有機會出來深造。目前已完成音樂博士學位課業，尚在等待考試結果。同時我已獲得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權，目前居住在墨爾本。為了紀念父親（今年適逢他誕辰八十週年），我覺得我有責任、有義務，寫點東西，因為我是作曲家，首先我創作了一首交響詩「我之泣」，今年三月已在澳洲公演。最近讀貴刊，我寫了這篇短文「父親，你在那裡？」，着重回憶「文革」之初及父親「失踪」前後的一些情況，不知對貴刊及對社會有沒有有一些參考價值，如能惠予刊登，則不勝榮幸。儲望華 啟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閱《傳記文學》一九八九年五月號徐壽成及李羣的兩篇文章，稱儲安平在「文革」中「曾到宜興家鄉徘徊」，後「由天津歸到滬洽，陷霧而死」。上述兩位作者（與父親均有鄉誼），都說此消息是「聽說」和「未有確證」。對於我——儲安平的幼子——來說，這倒是前所未有的「新情況」。讀以上兩篇文章，却勾引起我對父親的一些回憶，特別是在「文革」初期以及父親「出走」前後種種情形，願意將這些零碎的材料寫成文字，一方面公諸大眾，同時藉以表達自己對父親的懷念。

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星期日）。那天是「文革」爆發的第二天（當時我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任教，並在

在教員宿舍中），循例每週末回到家中看望父親。但見父親身體雖健，精神却頗為蕭索。那一天我們之間話語不多，家中充溢著沉悶的空氣。因為兩人誰都不知道（或許亦可說都已有某種不祥的預感）這場「文革」將給我們的家庭帶來何種噩運。記得父親挽起了他的朋友、歷史學家吳晗（當時正被猛烈批判的「三家村」成員之一）。父親說：「吳晗的問題和我一樣，本質上都是要在中國追求一條民主、自由的路，但都行不通。」因為在六月一日「人民日報」上已發表了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父親被劃為「大右派」，當然是在必被「掃蕩」之列。我當時心中感到無比的恐慌和憂愁。在這種心情下，我便與父親告辭。我緊緊攥著他纖弱的雙手，說：「

爸爸，您多保重吧！」不料這竟是我父子訣別的時刻！之後由於「文革」運動猛烈展開，我沒有可能再回去看望他。到了七月間，我亦自身難保，被做為「埋藏」在音樂學院的定時炸彈「揪了出來！」

父親「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與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朝白河自殺未遂後的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購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裏已經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就孤離開家中，走了出去……

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①

据储望华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近年来也有材料认为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湖南余开伟写过相关的文章。他说，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告诉他，储安平

^① 《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

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①

雷逸湘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一位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孙毅斌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1949年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

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吟先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易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

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有许多说法,不管真实性如何,这个人最终是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① 《书屋》1999年第2期,湖南新闻出版局,长沙。

第二章

《观察》的主要活动

第一节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

《观察》创刊以后,每出满 24 期,编者储安平就写一篇详细的总结报告,为论述便利,在以下的论述中以“报告书”称之。

在《观察》已有的历史中,储安平共写过 4 篇“报告书”,第 5 卷由于中途被国民党查封,所以空缺,第六卷为复刊后《观察》,由于基本方针已变,所以例行的“报告书”也自然消失了。现存 4 篇完整的“报告书”分别是:

第 1 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第 2 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

第 3 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

第 4 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

从“报告书”题目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储安平是将“报告书”作为《观察》的一种风格连续下去的,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客观、严肃认真地向读者报告刊物的经营状况、发行情况以及编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这些“报告书”是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思想历程极为重要的资料。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安平在选择创办《观察》的时

候,有过周密的考虑,他最终选定以办刊物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是在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支配下所做的严肃选择。

储安平在30年代初即创办过《文学时代》,后来做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抗战时在湖南做过《中国晨报》的主笔,一生的事业与报刊结下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迈开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第一步。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大年三十夜写的,由此可见储安平对《观察》的感情。在储安平的理想中,有一点非常可贵的精神,那就是他时时处处强调立言与行事的一致性。在记述《观察》创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的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发表的议论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①

储安平在《客观》周刊已初有影响的时候,毅然决定另立门户,创办《观察》,主要原因就在于《客观》只由他主编,而不由他主办,看到此事难有前途,所以他才果断放弃了《客观》周刊。

从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所阐述的《观察》创办经过中,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主张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行事也时时以西方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冯英子曾说过,储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办一份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梦想缠绕了储安平整整一生,他的事业由这个梦想始,也由这个梦想终,储安平是一个极富浪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深远见识来自于对这种理想的执著追求,他始终认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变成现实。不能说储安平是天真的,因为《观察》在他手中存在近三年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储安平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远没

^① 《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7页

有为人们所认识,他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参与政治的一个成功实践者,储安平是一个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尝试的报人。

《观察》的“报告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总结,而是充满灵性、富有思想和创见的报告,虽然它是就某一具体时期刊物的整个情况而言的,但在其中,可以感到一个自由灵魂的跳跃,他是自由的,他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他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努力把整个刊物的一切都详细报告读者,在报告书中,储安平每卷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他不仅统计了《观察》的读者分布,以地域分别报告,而且以行业分工为界,将《观察》的读者群详细地统计并报告给读者。

从报告书中,不仅能够了解储安平本人的思想状况,而且通过他翔实公布的读者情况,可以深入了解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

储安平在第一卷的报告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清醒而客观的评价。这种认识是他创办《观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观察》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保证。储安平认为,当时国内已经拥有一批广大的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也应当说话。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在此判断上,储安平认定,《观察》确应当是无党无派的,说话公平,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知识界的支持。他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价值。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还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而说话,而他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是因为他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当时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中国所极需。

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始终强调《观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意见,他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自由”与“宽容”精神。储安平在整个《观察》时期,在言论的客观上,在识见的宽容上是有非常杰出表现的。《观察》的言论能够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声音,与储安平的这种风度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准评论国是，同时他所做的又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在这种信念下，储安平对于热心组党的人颇有微词，他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他很赞同当时张东荪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观点，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在此认识上，《观察》无意组党，所以没有具体主张，也无意去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储安平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储安平在报告书中显得很有风度，无论报告财务还是本社同人的福利都很坦诚，绝无遮遮掩掩。尤其是对于自己，要求更是严格。在报告书中，他还专门报告了自己在办《观察》时期的活动情况。他说：“在过去的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它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为国家建设做长远考虑的理想是一贯的，在第2卷“报告书”中，虽然所说多为具体的刊物经营编辑情况，但这期报告书依然表现出储安平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告诫读者，《观察》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观察》的发行数是足以证明它可以自给，而无需仰求外援。储安平非常自信，对于《观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评价，那就是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靠发行自给的。储安平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要消极，一面争取更大的

目标，一面在自身的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他希望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国家的生命。

《观察》在出满第3卷时，由于储安平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时《观察》面临被查封的危险，面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储安平在第3卷的报告中坦诚自己的心情：“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反顾。”^①

储安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观察》发生危机的时候，储安平对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有关民盟事件的评论都照发不误，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所持的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储安平认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份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

① 《观察》第3卷第24期第7页。

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①

1948年8月1日,储安平为《观察》第4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②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它的价值。对储安平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有评价:“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③

储安平及《观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④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为自由思想的传播做了很大贡献。储安平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4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旋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于重新认识。

① 《观察》第3卷第24期第8页。

② 《观察》第4卷第24期第8页。

③ 陶文利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天津。

④ 《东方杂志》第41卷18号、20号、21号。

第二节 “《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20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的长处是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

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中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①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

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

① 《观察》第2卷第2期第8页

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赢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何永佶《中国在火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乾《红毛长谈》

樊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优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这些作者多数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周东郊的《新疆十年》多次刊出了出版广告,但最终没有出版,所以现在可以见到的完整《观察》丛书共有15本。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

《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曾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所收获的。”^①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

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民主风度。

第三节 《观察》与学潮

《观察》存在时，正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作为一本自由主义立场的周刊，《观察》几乎介入了一切与国家前途有关的大事，成为见证当时历史的重要刊物。

《观察》是政论性的周刊，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给予特别关注，举凡一切有关政治生活的事件，《观察》都有详细的报道。读过《观察》的人会发现，储安平对新疆问题、台湾问题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观察》曾出版过有关新疆问题的专号。对北塔山事件、西康民乱、台湾二

^① 《观察》第4卷第24期第6页。

二八事件都有详细报道，这可能与储安平对新疆问题的兴趣有关，也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情感，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统一问题的关切。^①

在1946年至1948年间，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引人注意的问题是学潮。《观察》对学潮的详细报道、评论，较为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评价。

40年代中期以后，学潮不断兴起。集中爆发的学潮体现了当时青年对国家的强烈不满，像历史上多数学潮的出现一样，它首先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对政府腐败的抗议。学潮的出现以自发性为其基本特征，政党利用和参与是在这个前提下发生的。1947年后的《观察》周刊，对于学潮的评价报道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从沈崇事件引发的各地学潮、反美扶日突击大游行以及全国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观察》都予以了充分、客观翔实的报道。

《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充分肯定学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我的热情。

二、对于由学潮引发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它的言论是支持学生，并保护学生的热情。

三、对于介入学潮的大学教授给予积极支持，对于教授在学潮中各种表现给予详细的报道。

四、对于政府迫害学生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对学生不仅给予道义上的谴责，而且呼吁政府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

储安平本人对于学生的行为有理性的评价，因为他本人受过大学教育，在思想深处对于青年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观察》在整个办刊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对青年热情的支持和肯定，他们没有责备过青年，对于青年的过激行为，储安平都给予宽容和理解，他总以为青年的热情是极为可贵的，容不得有少许的伤害。他认为：“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②

① 《观察》第1卷第14期

② 《观察》第3卷第16期第4页

对于学潮的不断出现,储安平的看法是这不能怪学生,政府理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大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

《观察》对当时各大学学生的民主活动很注意,像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观察》都不惜篇幅加以报道。因为在储安平看来,青年在学校内部所受的民主训练,与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有关。他认为,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在日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他希望“政府应当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①

学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失过。中国现代史上引发学潮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主权受到损害,二是现政权腐败。学潮较少有完全胜利的时候,但它在道义上总是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学潮的评价在1949年以前是这样几种态度:以大学教授为代表,他们首先是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学生,虽然他们常常劝学生安心读书,不要用这种行为和政府作对,他们本人一般很少直接介入学潮,但当学生在学潮中受到迫害时,多数教授一般能够挺身而出,出面具保,同时以签名和联合上书的方式抗议政府对学生的迫害。在学潮问题上,很少有大学教授完全站在政府一面指责学生的,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1948年,《观察》在将要被国民党查封之前,曾发表过文学史家刘大杰的一篇文章,名为《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这篇谈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文章显然是针对当时现实而言的。刘大杰认为,任何一种思潮一种运动的到来,都有事实上的时代背景,都有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一个经济破产、社会腐烂,民不聊生的时代,知识青年发出不满于现状的呼声,对政治有所责难,对于现实有改革的要求,这是表示时局动荡不安的信号。对于学生运动,刘大杰是肯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

① 《观察》第3卷第16期第4页

他认为：“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对于读书人都采取高压的政策，以大量的惨痛的屠杀，来消灭他们的力量，但后代读历史的人，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言行，无不加以赞叹和同情。”^①刘大杰认为学潮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统治者一面。

储安平《大局浮动学潮如火》的专论，对于学潮的分析评价与刘大杰完全相同。他认为，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而怪学生，只会垮得更快，他对学生的评价是：“学生挺身而出，对国家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

储安平说：“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腔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败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②

储安平在面对学潮的时候，能从公理和道义上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在《观察》时期，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储安平又写了《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的专论，他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对学潮予以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而非发动的，他们的行动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从《观察》时期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他们对于学潮的评价基本一致。钱端升对学生的评价是：“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

① 《观察》第5卷第15期3~4页。

② 《观察》第2卷第13期3~5页。

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的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①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写过一篇《我看学潮》,《观察》很快就在“观察文稿”专栏中全文转载。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开宗明义地宣称,对于学潮“我同情”。^②《观察》在第4卷第7期中还发表过一篇《谈今天的学运》的专文,作者回顾了从抗战开始以来发生的多次学潮,以此来比较当时学生的精神面貌。他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有理想的,同时他们的理想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他们有热情,同时也经过了社会的冷压。所以“他们比昨天的学生更结实,更坚定。这其实就是说他们能够发挥理智,发挥理智表面看非常简单,不过绝对不是那些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的书呆子办得到的。……今天的学生运动,理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③

赵超构发表了专论《论政府大捕学生》。他首先反驳了政府认为学潮被人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就任何观点看,学生批评政府是好现象,学生有知识,有热情,如果还不能有政治觉悟,还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兴趣吗?假如多数公民都能像现在的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勇于批评,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对学潮的总体评价,赵超构的认识是:“历史可以作证:民国以来的学生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固然都给当时的政府以烦扰,事后看来总是功多于过。”对于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呼吁:“我们诚恳地希望在处理过去以及以后的学生运动时,对于学生的政治表示有较宽大的看法,”而不要以暴躁的心理状态,对学生随意加以审判。^④

在赵超构文章发表后不久,《观察》又以同样头条专论形式刊出了律师张志让的文章《评全国学生被捕事》,文章对于政府搜捕学生及为此设立的各种借口逐条进行反驳,对学生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还有我们不应该忘却的,学生既为国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权,受

① 《观察》第2卷第13期3~5页。

② 《观察》第2卷第14期第17~18页。

③ 《观察》第4卷第7期第17~18页。

④ 《观察》第5卷第2期第3~4页。

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所以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学生加以迫害。^①

总括《观察》对学潮及学生的看法,可以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对学潮寄予同情,对学生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并用自己掌握的刊物,为学生进行呼吁,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学生受到政府迫害后,《观察》能够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这一切行为大体反映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

第四节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

从年龄上讲,在《观察》时期,张申府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一代人,对储安平来说,张申府算是他的前辈。在《观察》78位特约撰稿人中,没有张申府。在整个《观察》时期,张申府只给《观察》写过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吁和平》,发表在1948年10月出版的第9期头条。当时张申府还给《观察》写过文章,但因为时局的关系,文章未能刊出,为此储安平曾写信向张申府道歉,他说:^②

申府先生:

这件事我觉得十分抱歉。

先生的论新政协我们本拟发表,并已排好,但戒严令突然颁布,对于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起了变化,我们充其量所能努力的,只能在批评政府的一个范围之内,此间同人认为:尊文在目前的情形下,不便刊载。我希望先生能特别原谅。

附上排好的小样一份,藉以证明我们确是付排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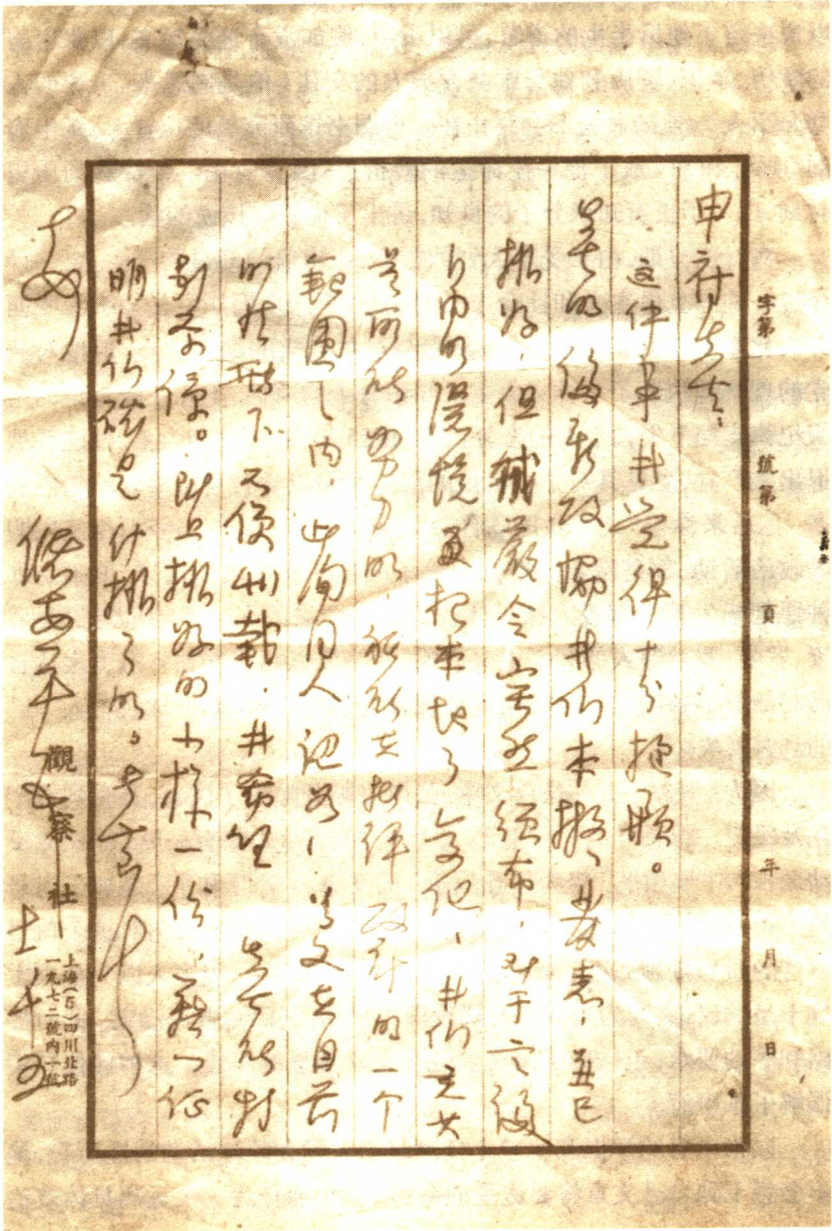
专此 即颂

大安

储安平 十一,十五

① 《观察》第5卷第4期第3~4页。

② 原信由李辉提供。



儲安平致張申府的信

《呼吁和平》这篇短文,对张申府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道路,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篇短文,以张申府的学历、学识、资历和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他是周恩来、朱德的人党介绍人),他的命运不会终止在一个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上。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讲出了他最应该说的话。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张申府信仰过共产主义,并译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张申府毕竟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过共产党的最初建立,但他对政党的理解却执著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愿在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支配下失去个人的充分自由。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产党,足见其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愿以学者身份参政的超然姿态。他后来参与“北平救国联合会”,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民盟等政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选择,他不是那种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具体政治活动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愿以超然的独立态度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对一切反人道现象的独特见解,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①

因为《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出了民盟,并受到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中收有一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呼吁和平”是加了引号的。虽然没有指明这一口号的具体来历,但可以从中看出对这个口号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其实误解了张申府。

以张申府的学识和他多年接触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看,他不会想不到自己文章将要遭受的命运。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

① 《张申府散文选》第5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北京。

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在客观上对参与战争的双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虑的,他面对的是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人民和丧尽元气的国家。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之后,才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具体的评价。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应当持这样评价:书生论政,惟负言责。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

其实张申府在1945年初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①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张申府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不要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

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反感,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这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他的呼吁和平,实

① 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重庆。



张申府

际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呼吁和平》中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以招犯嫌疑,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己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三章

《观察》的两次论争

第一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

1947年下半年,在《观察》周刊上,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以梁漱溟、张东荪和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和郭叔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但以往多数中国现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的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活动看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一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而无党派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场自由的学术论争。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第3卷第4、5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

敏感的问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心病,从当时历史情况看,知识分子没有人不认为宪政是好东西,但好东西是一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长时间。

一般说来,凡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多持怀疑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的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力陈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割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①

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梁漱溟的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一整套主张的,并不止政治制度一项。”梁漱溟是一

^① 《观察》第3卷第4期第5~10页。

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的体察,另外,他是一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论著,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一度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缘故。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①

梁漱溟一生曾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为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7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有不同的地方。

张东荪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概”和“乙概”的观点。他说:“最近《大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颇得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入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概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开这些容易误会的名词,而只把上一概名为甲概,把下一概名为乙概。甲概是皇帝的政权与官僚的政治。乙概是乡民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实行的互助。这种互助并不

^① 艾恺著《梁漱溟传》中译本第290页,湖南出版社,1988年,长沙。

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时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其中尤以社会方面为多。”^①

张东荪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民对土皇帝的受不了实基于全国性的皇帝”。他认为，后世儒家无不采道家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想用种种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没了。由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护乙橛。从这样的观点看，他始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可以说尽了他的使命，他们总是想在甲橛吞并乙橛的压迫过程中设法抵抗。他说：“中国古人（先儒）没有人主张把皇帝废除，这决不证明他们是为皇帝张目。因此，我对于儒家的看法和现在时流论客很不相同。我以为儒家在历史上说得好些是功多于罪，说得坏些亦只是功罪参半，而断不可认为完全是罪人。”接着，张东荪以甲橛和乙橛的观点，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多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天下式国家”。民族国家把甲乙橛打成一片，成为一个一元的。而凡民族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办法搬到天下式国家来，除了助长政府的权力，使其对人民更加高压和榨取以外，没有别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国文化上。

在梁张的文章之后，经济学家樊弘在《观察》第3卷14期上发表了《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一文。

樊弘认为，梁张两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这是行不通的。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征之后指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屡试而败呢？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敢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今天，始终没有造成一个可与地主阶级对抗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为旧社会所竭诚拥护。”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要看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否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如果是，中国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民主了。他预言，“中国今后还有一个劳动万能的时代。今后中国的建设需要由中国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亦需要这个伟大的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

^① 《观察》第3卷第7期第3~6页。

• 期四第十卷三第 •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

文化與政治

樊弘

在數近第三卷四、五、七期的「觀察」上，梁漱溟先生曾經發表了兩篇大文章，均以爲憲政不適宜於中國文化的需要。他們所舉的理由有兩點：（一）從中國的憲政史上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憲法都爲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的一次選舉，不是由金錢買得，但卻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二十二年曹錕選舉成功，其結果亦是特殊階級操作工具。現在的選舉且將比從前更壞。（二）更從中國文化的本質上說，中國不惟自由太少，而專制自由太多，實行憲政，適以加重其弊（梁說）。溯自滬寧開議以來，凡是西洋文化一進中國來，都幫助了「甲級」即皇帝的政權與官體的政權，除使其對人民更形高壓和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梁說）。梁張二人對於中國文化積習的解釋雖不盡同，但酒極的否認憲政則一。然則中國的文化所需要的政治是什麼呢？現在且讓我們來看梁張兩先生所給的解答。

依據梁先生的意見，中國需要少數的高明深遠的哲學家來治理。他說：「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等所能辦通，而必有於高明深遠的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非他這真才得疏解不通，無例此帶，而後在各方面而照顧到之下，始敢一着。厥可出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梁先生這種主張，很恰恰放圖在希臘的時代，假使有新巴達魯帝國的學風盛感而羅馬皇帝的淫快無能，本其進而救世之時代，主張以哲學家來做皇帝，依照孟子的原則，來治理治國，有幾何同。

依據梁先生的看法，政治有甲級和乙級之分，甲級是皇帝的政治，乙級是鄉民爲了地方公益，而實行互助。中國是甲級之下，保留了許多乙級。在這一點上，梁張兩先生確有大功。中國不但需要乙級，而且需要甲級。儒家思想在保護乙級，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抵觸，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但要怎樣能達到這目的呢？梁先生說：「這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的學者同時又兼西方文化與政治，想構的

學的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一個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政治需要一些通儒來領導。

總括來說，就是梁先生與張先生因爲看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到中國來都碰了，因此，他們在根本上，都否認民主政治，而主張少數統治，或通儒政治。

梁張兩先生和我這地位後輩，都是普通儒家哲學家的政治。記得我在四歲的時候便開始讀經，一直讀到十一歲。雖然那時並不真正了解儒家哲學，但在行爲上，却很受我的先祖父母的儒家思想的指導。在大學畢業而後，感於我的生命之中，融入了不少的實踐主義的成分，但我的人生行爲上依然爲他主宰。直到抗戰之時方纔發生懷疑。儒家的哲學曾同我給了一段這深淵的關係。今看再經過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好像一個在孤島之外浪蕩江湖的孩子，忽然看見他的鄉里兒時的故友一般，特別的感到真誠而親切。可是現在我已經不相信儒家的思想可以救國了，所以，我對這兩位前輩所主張的通儒治國的理論與通儒治國的理論，雖然覺得高尚而深奧，但我却很難信任他是救治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病根的良方。我想把我的意見盡情吐露於後，請求兩位前輩教正。

我以為梁張兩位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如果要想有效的付諸實施，必先具備兩個條件：（一）通儒們必須是中國的統治者了，因此他們可依照他們的高明深遠的哲學來治理。如果沒有，在明日我相相信他們的通儒治國的哲學尚未變成中國的統治者，但統治者却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不但不很虛心，而且特行實踐。可是今日日的中國並未具備這兩個條件，在昨日亦是沒有，在明日我相相信然是不會有。所以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最多只是，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一種新產品，好幾個人先生們在他的富麗堂皇的客廳裏所陳列的希世之珍一樣。但我恐怕這小小的希世之珍的地位，在中國也是不會得到的啊！假如世上大多數的人，或世上的統治者階級，果肯依照哲學家的高明深遠的哲學以治事或治國，那末，世界也許早就好了，並也不用看梁先生和張先生的

《观察》发表樊弘文章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答張費二先生

梁漱溟

要討論一個問題，就要徹底討論才通曉；只說一些零碎感想，實在沒意思。假使非為情勢所逼，我是不願寫這篇文章的。上次「留書張費，追論憲政」一文，只為當時被個人一個問題之提議而已，談不到中國政治問題之討論上。現在此文自然更談不到。只因爲張東蓀先生寫了「我亦追論憲政及文化的診斷」一文（見本刊三卷七期），又東蓀先生所引的「基層行政的優化」一文（見大公報），既爲張先生所引用；費先生更有「再論雙軌政治」一文（見大公報），答覆張先生和幾位其他朋友。文末且明白提出幾個問題來問我。凡此，我若全然置之不答，似乎不好。於是極不得已，又逼到寫此。

第一、我聲明：我上次那篇文章只說「一個人自己出頭競選」，——或說大了說「選舉競爭」——不存於中國。我並沒有說選舉制度之根本不能行。我並沒有說中國不能行選舉；當然更沒有說到中國不能行代議制。然而張先生文內，却忽然說我認爲中國永遠不能有真正選舉了。費先生文內，却忽然說我認爲中國不能行代議制了。這真未免聯想太多，推想太過。據說有一位頗肯用心底先生，看了我那篇文章，表示看不懂。又聞張先生文內，提到「鐵路飛機輸入中國所給我們的災害，引起了吳景超先生寫一篇『鐵路飛機不可反對』的文章。真令我懷疑：究竟寫一篇文所給人的影響，是增加了明白，還是增加了不明白？

在我自己方面對中國政治問題，是早有答案底。並非只有消極底批評，而是有正面主張，且是有一具體方案。這方案在我前時發表，已具輪廓；抗戰中更加成熟。在戰前已多少有所發表；戰中戰後，亦不時向人談；亦會著之文字（如在香港及桂林）。其奈時人不相信何！現在正謀爲正式完整之發表，而先從理論入手。那其間，自不可能沒有選舉制，沒有代議制；不過從精神到面目，都將與西歐和蘇聯不同罷了。

第二、張先生說我只看見中國傳統政治中他所謂「乙軌」之優點，而忽略了「甲軌」；且論定甲軌爲非完全是壞底。這我不能同意。張先生以其「甲軌

」之「乙軌」代替費先生所說「雙軌」，殊覺有所不足，此在費先生「再論雙軌政治」文內已經聲明。費先生於傳統政治有明文之一軌（自上而下者）外，復見出其無明文之一軌（自下而上者），而申明其爲雙軌，是很對底。還有其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之說，都是很對底。將甲乙兩軌於雙軌之中，則可；離開雙軌平行之義，而說兩軌不可。上下既相連相聯，則似難以劃出一條好步，一條壞。我們應當知道，中國傳統政治（指秦漢以後）早已落到只能如此地步，無法再轉。它有時已上達於其所可能有之好，有時亦會下墜於其所可能有的壞。無論其好其壞，總皆與今日情勢完全不合。我初極取其一一軌之意。

張先生費先生以其於現代學術之淺識，又對於固有文化肯用心，一切都復通達，在國內實在不多其人。但張先生缺乏費先生那樣在鄉村住過一時的生括，對於鄉村知道底不親切，諸多想像。又見我多年致力鄉村工作，便謂我喜歡那「乙軌」壞了。

第三、張先生的意見，中國今天選舉所以不能辦，就爲特殊勢力之利用它；若撤除了特殊勢力，而講說選舉不能辦，則無據。我認爲：至少是我原意並非如此；再則我亦不能贊同此意。因此文只在作答覆，作聲明而止，所以現在不討論下去。

第四、費先生以爲我不贊成代議制，於是發生不用代議制，用什麼之問題。我現在不能正面答覆用或不用代議制，以及用什麼代替它。——此殊非本文所能及。我只作下列兩點聲明：

一、從我上次那篇文章內，強調要有方針有計劃來建設，且要把一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風治爲一，來看，則其勢必齊軍加強自上而下那一軌道，可無疑。於此，舊日政治上之第一道防線——無爲主義——固必撤除；即第二道防線——中央權力懸空起來，僅到縣衙門爲止——亦必須撤除。如某君所強調保甲制度之需要，是有理底。國人亦許把記得二十多年前，山西村政是全國有名底。那政爲隔錫山在山西當真發見，新設兩道防線，連續工作

《觀察》發表梁漱溟文章

与樊弘文章同时,梁漱溟又写了《略论中国政治问题——答张、费二先生》,对于张东荪的文章和费孝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再论双轨政治》一文进行了答辩,梁漱溟认为张费二先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他的意思,然后又逐条阐释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①

樊弘文章发表之后,张东荪又写了《敬答樊弘先生》一文。首先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通儒主政之说。然后指出他与樊弘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认为,一种政治理想由于人们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实现,是一件事,而这个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类幸福,又是一件事;这样在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情况,一种重现实,一种重理想。注重现实的以为一切都是由现实推演而成,高谈理想的以为必如此如此为算为好,其弊在于绝尘而奔。但注重现实也难于说清为什么会有进化。张东荪认为两者都趋于极端,都有毛病。

张东荪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未即全体努力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对此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他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并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②在文章的最后,张东荪指出樊弘所说的集体劳动在中国也行不通。

张东荪的文章刊出后,樊弘立即又发表了《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最后答复梁漱溟先生和张东荪先生的指教》一文。

樊弘认为,任何有益于大众的物质幸福的政治主张,其所以不能实行,多半不是由于这种理想缺乏哲学的根据,而是由于他与特权阶级取得的收益方式相违背。他认为梁漱溟系统的政治理论是由少数高明深睿的哲学家来制出一个救国大计,而用这个救国大计,只可由少

① 《观察》第3卷第14期9~11页。

② 《观察》第3卷第18期第5~6页。



张东荪

数人讨论,不能付之多数表决。在樊弘看来,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必须首先对于特殊阶级表示态度,他说:“假如说一个人的关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极力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各阶级联合起来,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压迫阶级的,那么我便觉得这种主义大有实现的余地,我所谓的被压迫的阶级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特权的或压迫的阶级立于对立地位的一切的阶级。假如说,一个主张民主

和社会主义的人不去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阶层,或不是主张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各阶层,必须一起联合起来,推翻被压迫的阶级的,那么,我便敢说,他的政治主张,无论说的如何好听,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权的阶级统治地位,其结果一定是不能实现的。”^①

作为经济学家的樊弘,在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很显然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主张以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也正是他与梁漱溟张东荪分歧的根本所在。

对于樊弘的答辩,张东荪很快又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主张,在苏联和英国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即战后东欧几个国家实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吸纳在这个广泛的类型中,并说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标准。接着张东荪比较了东欧民主和苏联的不同,他说:“第一在政治上不仅是有一个党(如苏联),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一个统一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

^① 《观察》第3卷第23期第3~4页。

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

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一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的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身引起的。这篇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察》编者的某一倾向。

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一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一种文化预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

《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第4卷第7期上的一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

樊弘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是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

樊弘说:“革命的路,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

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而缺少纯粹知识分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他甚至主张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了。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年7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作为“观察丛书”之一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一贯主张的“以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

张东荪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观察》在1947~1948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是在国共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一群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远的历

史眼光。

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即使偶有提及,多数也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①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7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萧公权阐释民主概念时,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②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谛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各有各的侧重。^③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他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它,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

① 《中国现代史》下卷第370~37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

② 《观察》第2卷第7期第3页。

③ 《观察》第1卷第13期第9页。

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①

《观察》在1947~1948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②

马歇尔在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予厚望,有相当的远见。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榘在《观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争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榘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

① 《观察》第2卷第12期第23页。

② 天津《大公报》1947年1月9日第3版。

野百
合花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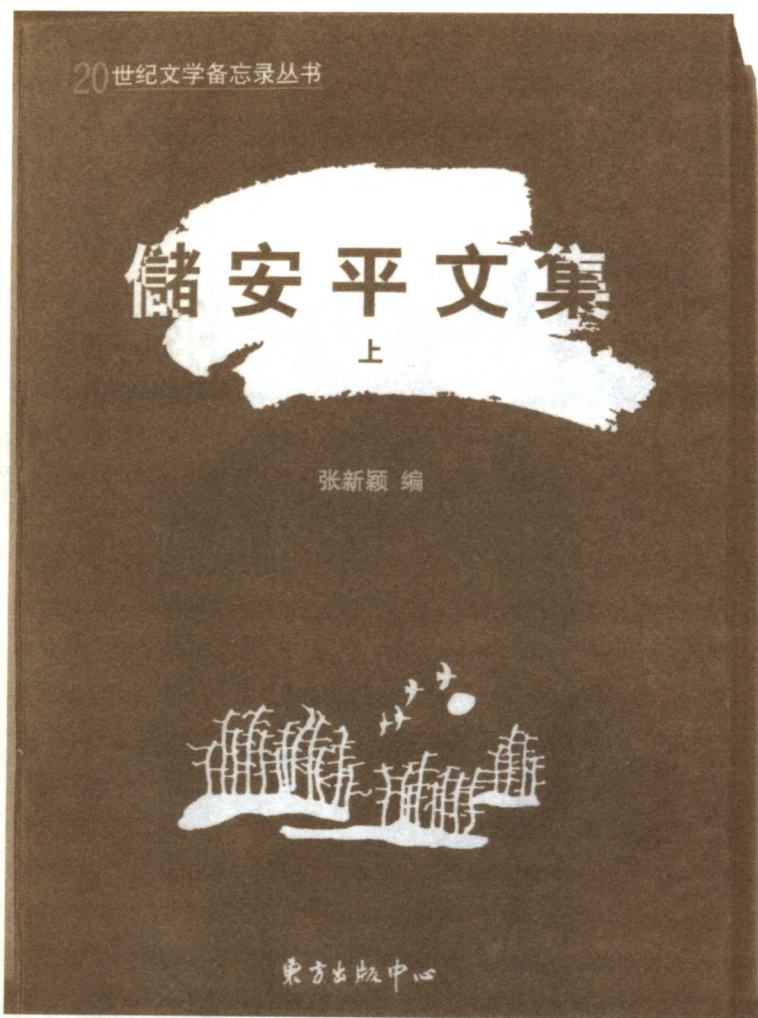
一切事物，人，思想，其形态，总不外乎，
是动，或静。人生如一块饼，在这面看，饼上有芝麻，
有花纹，而站在那一面，除掉一个平凡，
此外便看不见什么。

储安平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泳
编



一本关于储安平的文集



新版《储安平文集》封面

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榘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论调而言的。杨人榘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杨人榘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风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榘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些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

杨人榘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①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分析评价一致。

对于自由主义,惟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榘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

杨人榘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时,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榘以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

^① 《观察》第2卷第11期第3~6页。

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对于当政者来说,自由主义可能是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

杨人榘《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本文是他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写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杨人榘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特别是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榘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

杨人榘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①

杨人榘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回应。

李孝友基本不赞成杨人榘的观点,他认为杨文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孝友历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

① 《观察》第3卷第10期第11~12页

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孝友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他认为,历史交予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两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①

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梗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

施复亮没有批评杨人梗及与其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述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

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②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① 《观察》第3卷第19期第7~9页

② 《观察》第3卷第19期第7~9页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①

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②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

① 《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② 《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治》。

朱光潜与杨人榘、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①

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榘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②

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 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

① 《观察》第3卷第19期第20页。

② 《观察》第4卷第3期第3~6页。

“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①

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②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③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

① 《观察》第4卷第8期第2页

② 《观察》第4卷第6期第5~6页

③ 《观察》第4卷第1期第3~5页

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这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建设上的看法,确是非常有见的。不过对文化上的自由,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其实计划的社会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

1948年10月,杨人榘又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回应。杨人榘保持了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榘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榘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①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诩超然,杨人榘对此也做了回答。他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榘也做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

① 《观察》第5卷第8期第3~5页。

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张票更有价值。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从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

杨人楩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进步的观点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明白在当时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精神，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潮流来考验吧。”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

张东荪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

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①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

张东荪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张东荪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很耐人寻味。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

^① 《观察》第5卷第11期第3~5页。

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观察》这场讨论,随着它的停刊而结束了。但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度并没有随着《观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义,重新回顾这场讨论,会发现今天面临的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和当年一样,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努力,虽然结果不理想,但其精神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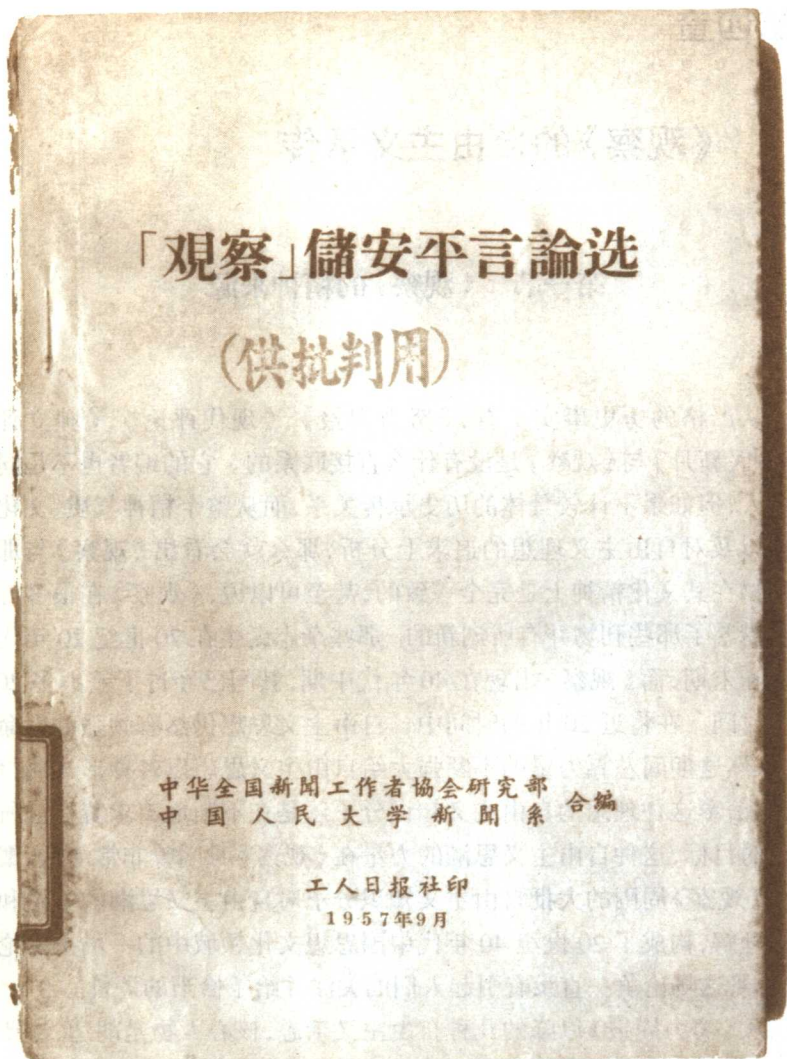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

第一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

从严格的历史事实上看,《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和《新月》与《观察》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它的编者也不是同一个人,但如果不计较具体的历史承传关系,而从整个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以及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分析,那么就会看出《观察》与那些刊物在其文化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观察》在很多方面是借鉴了那些刊物并有所创新的。那些杂志诞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和末期,而《观察》出现在 40 年代中期,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中,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这期间左翼力量的不断强大给自由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的打击,但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力量在《观察》时期曾非常活跃,聚集在《观察》周围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和不同理解,构成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场主要论争,尽管这场论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从《努力周报》以降的几种自由主义杂志,核心人物是胡适,主要成员以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为主。这些刊物的性质和撰稿人基本相同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刊物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陈西滢在谈到《现代评论》和《新月》的关系时说过:“《现代评论》是《新月》的前身,



「观察」储安平言论选
(供批判用)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 合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工人日报社印

1957年9月

批判储安平的一本言论集

话虽说的有点道理,因他们都是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但门户不同,不容易合起来。”^①陈西滢的评价有两个意思,第一,从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看,《现代评论》的确可以视为《新月》的前身。第二,如果离开这个整体的文化精神,则《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也有不同。从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着眼,《观察》是继承了《现代评论》和《新月》自由主义传统的。从三个刊物所设置的栏目、撰稿人及撰稿人的文化背景,刊物的风格上,把三个刊物联系在一起,能感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且《观察》更接近于《现代评论》。

储安平曾留学英国,在《新月》第3卷上曾发表过几篇散文,徐志摩遇难后,还在《新月》上发表《悼志摩先生》,其中多处叙述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储安平本人在政治上受胡适的影响较深,在文学上受徐志摩影响,所以《观察》虽然是一个政论刊物,但储安平毕竟由文学起家,对于文学有割不断的情份。在《观察》每期6万字的篇幅中,特意设立了《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栏目,每期都发一点这方面的文章。

1924年,《现代评论》创刊的时候,没有发表专门阐述本刊宗旨的文章,但发表了一则《本刊启事》:“本刊筹备,已经半载,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才获出版。同人等对于曾允赞助本刊的许多朋友,实深抱歉!本刊内容,包涵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纯为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②《现代评论》的这则简短启事,显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理想。

1928年,《新月》创刊的时候,发表了《“新月”的态度》。这篇类似于“本刊宗旨”的文章宣称:“新月刊是独立的”。它强调除了刊物本身和同人在文艺与学术上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组织,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之外,没有什么一致。那么他们的共同的理想是什么呢?徐志摩使用的是极富浪漫气质的诗一样的语言,但在这浪漫的激情下,会

① 《传记文学》第18卷第4期第24页。

② 《现代评论》创刊号第2页。

发现,他们的理想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原则,用徐志摩的话说就是:“在这头骠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我们不能不配起,不能不奋斗,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间。”^①

《新月》初期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艺刊物,到了第二卷开始,《新月》又回到了当年《现代评论》的路子上去了。而《观察》正是从这变化了的《新月》上获得了更为明智的选择,一直把政治放在第一,文艺倒退居第二了。1930年1月10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新月〉敬告读者》一文,可以看做是后来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前奏,两篇启事不仅内容大致相同,甚至连使用的语言都无什么大变化。《〈新月〉敬告读者》中说:

读者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从第2卷第2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地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谈政治的由来及今后谈论的计划略为读者诸君告。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这几点是我们几个人都默认的。如今这个时局是真沉闷,但是这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安。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9集第66~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上海。

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是极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文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之先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读者无意地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的新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没有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批评的工作。

储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他对《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评论》的路子。储安平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①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

^① 《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

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负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第二节 《新路》与《观察》

关于《新路》的情况要先从萧乾说起。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①从萧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他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

^①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21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北京。

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萧乾是1979年说这番话的,他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①

1948年1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两栏。^②

1948年3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月2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

《新路》的创刊号1948年5月份出版。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

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24期,时间是1948年10月23日。第2卷出至第6期,即停刊,时间为1948年12月18日。

《新路》在第2卷第1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③

① 《巴金书信选》第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

② 鲍霖编《萧乾研究资料》第23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北京。

③ 《新路》第2卷第1期第2页。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卷发行总额的规定”，“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牒，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项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飭办等因，奉此，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一个见解，就是在宪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一党专政之下，养成了一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一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务人

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地向人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压迫逆耳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耳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试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做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发现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把他公开，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一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

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20世纪40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学术来评价,可能他们当年的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

《新路》能在那样的时代里很快出版,就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们还决定在北平找所较大的房子,买些参考书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

里讨论问题；从南方来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来我们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东直门大街。”^①

筹办《新路》周刊的同时，他们又商定筹设一个机构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2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绝大部分是文化人，只个别的人是资本家。成立会上选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和萧乾。监事三人：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社经会的惟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是钱昌照筹的，资委会出了些钱，宋子文也出了些钱，但宋并不知道办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刊物专辟一栏，赞成和反对马列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此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香港方面的保守和进步舆论都对它不满。而蒋介石则横施压力，先是严重警告，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又勒令其停刊。

钱昌照曾说“1949年我来到北平，周恩来对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

《胡适的日记》1948年1月24日记载：“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思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②

钱昌照这样回忆：“我在辞职后出国前的一个阶段里，在北平创办了一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吴景超等执笔。因社论中多次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一度被社会局勒令停刊，复刊后的社论指责蒋介石更为严厉。后该刊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停刊。办了 this 刊物，进步人士乃至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

① 《钱昌照回忆录》第89、101、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北京。

② 《胡适的日记》第12册、第16册，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北京。

反‘革命’言论。蒋介石得知是我办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找了我秘谈，劝我早点出国。”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当时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不过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的。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实业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新第三方面”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这个会的一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更非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个新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

候,只要有人肯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长此窒息下去,人们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机。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的民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恭维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界的朋友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

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下面是《新路》的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刊以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又声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

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会的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这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正的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一种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作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极为合理的一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士，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想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 with 事实来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

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同，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相同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人自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行事。我们希望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助，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这是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

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敬意。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发现胡适写给储安平



胡适

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①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

后来《观察》在第3卷第7期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

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1947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②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39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25页。

适之先生：安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三卷撰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一般常见到的是储安平写给胡适的这三封信，而见不到胡适的回信。耿云志在介绍胡适的私人档案时曾说：“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他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在新闻界的名单下，列有储安平的名字。^①

从这三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很有好感，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言行都给予重视。在1947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②

《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惟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与费孝通的信，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由费孝通提供。

胡适针对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信给费孝通。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

《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③

① 《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第78页。

② 《观察》第1卷第3期第4页。

③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205页，三联书店，1985年，北京。

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失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可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下面是胡适和费孝通的通信：^①

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信）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丘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丘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 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 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 North 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 Lord 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

^① 《观察》第3卷第4期第23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中，收入费孝通致胡适信的全文。略去的部分是：“接到八月廿五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以称你做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误及读者。”“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为消遣之用。”见该书第233页。

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

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丘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 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创刊不久,就在“《观察》通讯”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足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①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客观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

^① 《观察》第1卷第1期第21页。

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都要涉及胡适。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比如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①

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言论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提醒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上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同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②

第四节 《观察》的言论与四十年代大学教授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可以说是一个教授的杂志。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是因为注意到作

① 《观察》第3卷第21期第17页。

② 《观察》第2卷第14期第19页。

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较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①

中国的大学教授对国家的热情,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当时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精神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主要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得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②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它在一篇《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

《观察》对教授和学生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

① 《观察》第2卷第6期第27页。

②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重庆。

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①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

《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

^① 《观察》第1卷第6期第17页。

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的，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气氛。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①

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查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与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

教授在学潮中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常的，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教授对时政的看法

^① 《观察》第1卷第6期第17~18页。

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当时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比较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讲。

《观察》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①

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员。在清华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很能看出他们的性格:

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②

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大学 90 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 90 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时大部分知名教授。他们认为:^③

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地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借暴行来挑畔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借以制止层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诧异。

① 《观察》第 4 卷第 7 期第 14 页。

② 《观察》第 2 卷第 14 期第 20 页。

③ 《观察》第 4 卷第 10 期第 2 页。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样的惨剧，祇足以表现其颛预与残暴而已。

当时《观察》经常发表这样的意见。如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①

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以专业为借口，远离社会政治。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观察》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大学教授对政府的批评。下面是《观察》上一篇大学教授的宣言。^②

保障人权

宣言者：朱自清 向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达 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 汤用彤 杨人楩 钱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北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

① 《观察》第2卷第15期第21页。

② 《观察》第2卷第2期第21页。

午夜闯入民宅，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囹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于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博士，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学生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发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为保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

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柵、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作风。^①

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朱自清、陈达等四十八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②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

① 《观察》第3卷第8期第3页。

② 《观察》第3卷第11期第3页。

宪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在《观察》时期，有法学专业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他们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①

第五节 《观察》的复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

1949年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转变，多数人能够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后人不必责之过苛。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屈服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四、信仰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情和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偏差？等等。

《观察》1948年底被迫停刊，到1949年11月1日复刊，其间仅有10个月的时间，但这10个月，却是至关重要的，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新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暂时的慰藉，连年战乱，外敌的入侵，经济的崩溃，人民的苦痛，使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但矛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共都有清醒的评价，所以难以相信1949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真诚的。这里可能有一个“青年信仰”的问题。

“青年信仰”是指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

^① 参阅楼邦彦《论公然反对政府》《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论动员勤乱时期临时条款》。韩德培《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分别见《观察》第2卷第13期。第4卷10、22期。第3卷11期。

括传统教育和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仰”冲垮?

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发出,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起码的敬意。而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的。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另外一回事。许多知识分子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

1966年自杀的翻译家傅雷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年前的傅雷家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①

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对毛泽东1957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傅雷认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① 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08、122、134、158页,三联书店,1990年,北京。

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

复刊后的《新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 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词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新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

文章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不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成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①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① 《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

第五章

《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第一节 关于“《观察》撰稿人”

“《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1947年初，《观察》出满第24期后，储安平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的文章，储安平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①

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履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做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

^① 《观察》第1卷第24期第4页。

所以不能不竭力縮減。在那張擬就的名單上，有一小部分仍未發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接洽的許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復函“不克擔任”，有8位先生迄無復信（各信託人轉致，是否轉到，不明）。其餘大都函復“遵約擔任”，並除寄回印就的復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勵我們。有許多刊物常常不得本人允諾就將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為“特約撰稿人”，我們深不以此種態度為然，故凡非確實函允擔任者，我們未敢貿然將其姓名列出。我們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發生更關切的感情。現以第一卷而論，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儲安平先生發表了所謂“覺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教主義的根源”的謬論，向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提出挑戰，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有他的社會的歷史的思想的根源。同時這件事也向我們表明了，在儲安平先生的思想深處，仍然牢固地保存著一個資產階級的帝國，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主義”仍然在一些知識分子心目中陰魂不散。

三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大都知道儲安平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主編標榜為“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觀察雜誌而知名於世的。雖然觀察雜誌明文規定文責自負，它所刊載的論文論者並不一定同意，但是整個的說，這些論文的傾向（特別是儲安平自己的論文），實質上是代表當時所謂“自由主義的道路”，所謂“中間路線”的。1947年毛澤東同志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布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而當時的“自由主義的道路”“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就是這種反動政治傾向在思想戰場上的反映。

1957年批判儲安平的一篇文章

我不願低估觀察雜誌在揭露和抨擊國民黨反動派腐朽透頂暗無天日的統治這一方面的作用。但是作為民主革命時期的右派，他們也散布了許多惡劣的反動的影響，阻礙了人民群眾覺悟的提高。許多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影響下躊躇徘徊，不能早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當時的儲安平先生和觀察雜誌在國際關係上採取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故友不分，經常將蘇聯與人民所深惡痛絕的美帝國主義相提並論，甚至散布反蘇濫調。例如儲安平曾經公開地支持楊光時等十人提出的組織“民主國際”用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建議。當時儲安平會同吳世昌一起研究了楊光時等人的見解。吳世昌在“論民主國際”一文中寫道：“本刊的編者儲安平先生使我在此文（指楊光時等十人的文章）未發表前有讀到的機會。我們都認為這一篇文章中所提的若干見解，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從未經人說過，且極有建設性的價值……大體上可以令人同意。”（見觀察2卷22期吳世昌論民主國際）

在國內，中國人民與反革命正處在生死決鬥時期，在漫天的革命大風暴中，儲安平先生盡力散播改良主義的毒藥，標榜出所謂革命以外的自由主義的道路。本來，改良主義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半封建

儲安平在民主革命

半殖民地舊中國沒有廣泛的階級基礎。三大敵人在政治上是窮凶極惡的統治，不給人民以任何民主權利；經濟上是敲骨吸髓的剝削，不僅使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活不下去，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處在復巢之下，岌岌可危。因此中國人民除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革命以外，別無出路。但是儲安平先生却在反動派已日暮途窮，革命已經勝利在望之際，通過觀察和自己的一些著作（如英國采風集）在理論上大肆宣傳資本主義民主的優越和英國工黨的德政。在他的生花妙筆之下，虛偽與欺騙變成了誠實和公正，把建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血汗上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貴族的統治描繪成一幅綺麗動人的圖畫，說成是中國人民應當遵循的最理想的道路。

雖然儲安平先生也經常激昂慷慨地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但是作為一個改良主義者在思想感情上對反動政權必然是情意綿綿藕絲連的。因此往往在抨擊了國民黨之後又顯露出策士的面孔，為國民黨借箸一籌。例如1947年“五·二〇”學生運動中，儲安平先生在“大局局勢、學潮如火”一文中最後就

說什麼“要執政法家，一一見之莫切需要者，實莫犧牲他們已得的。這樣，人心才能平作為一個改良主義者，是同共產主義和的。因此儲安平民的希望——革命，像對國民的甚至更大的眼。我們現在爭取自由，這個‘自由’的問題，假這個‘自由’就‘無’的問題了。日共共產黨大唱其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的政。就就黨和法西斯黨都企圖透過严厉的意志。在今日國家起來反對國民共黨的其精神也是‘黨主’而

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从储安平论述中，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作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

革命时期就是右派

兵

局拿出良心和办。今日中国最迫于执政当局能够部分权利，唯有社会才得安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上必然相抵触。革命相抵触。生当时对于中国国共产党和人民一样表示了同样。他说：“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还是一个‘多’。坦白言之，今日‘民主’，要知共实是在一个反民精神上说，共产党任何区别，两者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中国的政争中，”“无非要鼓励大的‘党主’，但就共产党所主非‘民主’。”（储安平1947年观察二卷

二期）如果把这些诬蔑言论与今天储安平先生所谓“党天下”论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相比，虽然隔了十年，我们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前后是一脉相承的。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和旧社会已在分崩离析的前夕，连储安平先生也看出“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业已陷入暗谈与苦痛之中。”“据我们观察现政权已失挽回这个颓势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势的自信心。”但是储安平竟敢狂妄地要争取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提出：“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在这种两难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自由思想分子可以

起来，应该起来。”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当时还分析了所谓“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认为自由思想分子的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他认为民盟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组织。他认为民盟的领导人物中沈钧儒、黄炎培等人都是过去的人物，只有罗隆基一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章都来，有煽动力，有原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因而，虽则“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但是‘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罗生（隆基）先生一人’。（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被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把这些言论和今日储安平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要共产党下台”“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等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谬论加以印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右派分子的本质，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但是很遗憾，螳臂毕竟不能当车，不仅美帝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连储安平先生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分子”“中间路线”都没有扭转历史的车轮。1949年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完全覆灭了。而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观察杂志，储安平先生才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参加了革命。

尽管储安平先生在解放战争时

期散布了这么多的反动言论，但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仍然历史唯物地对待这些问题，并没有对他有所苛责。并且在工作上地位上予以适当安排。选他作全国人大代表，使他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个重要职务。作为一个观察的读者，我也曾以极其欣慰的心情，看到了储安平先生在1949年11月解放后出版的观察杂志上进行了自我批评，能初步认识自己的错误。后来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储安平留居新疆，写出了些歌颂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光荣业绩的报道。我多么衷心地希望他能够彻底地改造自己与人民共同前进。但是曾几何时，储安平先生竟露出了尾巴，又对共产党进行诽谤诬蔑，又狂妄地要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但是时代变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的工农与知识分子联盟面前，储安平先生企图贩卖资产阶级私货的企图被查获了，“民主自由主义”现在已没有广泛的市场。但是这件事情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对于许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从各方面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同样需要脱胎换骨。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早晚会抛出时代的列车”！至此我不禁再咀嚼伏契克的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①

今天虽然见不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

“《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并不因为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但他们较多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的情况,而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②

1949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会

① 《观察》第1卷创刊号第3页。

②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60~204页,三联书店,1988年,北京。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南京。

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年反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1966年文革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10年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但在1978以来,在20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无不带有自由主义者的气质。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第二节 储安平、徐铸成的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提到的“不克担任”的撰稿人,就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 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①

徐铸成在《我的同乡》里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2年。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

^① 《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第168页。



駁儲安平的謬論

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以后，少数右派分子不约而同地向党展开攻势，發表了种种謬論。这种现象，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紛紛起来应战。在思想战线上，金鼓齐鸣，剧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

这些右派分子，發言的地点不同，時間不同，意志不同，声調不同，可是分析一下他們發言的精神，有的一脉相承，有的呼應相应，有的說非即實，有的相反相成，总之，是“身無彩鳳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面上形形色色，各極其我，湊在一起，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主义大合唱。

在各种謬論中，儲安平的謬論是很突出的，因为他化輕得巧妙，說得很有趣，因此也很容易迷惑人。把儲安平的謬論剝一個皮，讓大家看看它的本相，也就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我們国家已經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时代，但对知識分子來說，却不意間正在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却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考驗，大多数人是很誠意的；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三心二意，半推半就；还有更小的一部分，总是未能忘情于资本主义那一套。——他們表面上好像也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可是言不由衷，在实践过程中，却充满了对党的抵触情緒；甚至想入非非，别有怀抱。

原想一片“關心國計”，既說得再好，文章編得漂亮，是毫無補处的。按能說老实话，如說不过關人，能掙掙一時，却不能維持久遠。因为对这些人來說，头的“拥护”不过是掩耳盗鈴；一經风吹雨打，就立即生虫时的情緒，用實非常明显的。

如何辨别拥护和假拥护？很复杂，也很重。說复杂，是因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千变万化，細微曲折，应用一般的推理方法，未必能洞中肯綮。听其言而观其行，则需要更深的考驗。细心的分析；同时没有会說好的知識分子，难免思得愚矣，忽起忽冷，也不能根根究底一时一地的一行一止，胸下断罪。要慎重，是因为我们大英官目，翻轉考驗一下，并不难正确判断一个人基本的政治态度。

什么是当前的大英官目？第一、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否心口如一地地說；我們从旧社会翻身，是党領導的；而且从多次多难变得有容有為、强大兴旺，是党領導的。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是党領導的。党的領導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它根植和巩固了人民在那些事务中的主人翁地位，因为党和人民是血肉相連的，党是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者。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这一边，全世界无产阶级專政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边。这是一个关于根本性質的問題，对党的态度如何，是一块最好的試金石。第二、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統一，是我們力量的来源，料不須詳證。在政治問題上，不取什么态度？一心一德，还是离心离德？那对党核心政策的态度，还是更問大家談意見，第三、党有缺點和錯誤，如何对待？是否自己一人一幫，知無黨然，愛之深，責之切，一面广加聲援，一面高唱信心；还是採取成語，老牛拉車，破坏党的威信，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

儲安平的謬論中，提出了所謂“党天下”的謬論。大家都知道：我們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一方面——作为工人階級領導的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領導地位；一方面——各个党派、各个階級、各个民族、各方各面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政权。这些黨也無法抹杀的事实。可是儲安平竟說，共产党有一帮“莫非王土”的思想，从而形成

了“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从我們国家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都是党员說起，一直說到“在全国范围内，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兒，事無巨細，都要看党员的臉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數。”他用旁敲側擊、皮里陽秋的手法，由此証明“清一色局面”已經剥夺了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使他們無从發揮“自己的見解”，他們的“貞操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大家也都知道：党是从民主黨走出来的，主張不断扩大大統一战线，坚决反对宗教主义的。这一次的開門能風就是証据。可是儲安平却判定：这一个莫須有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教主义現象的階級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問題不能不問的党外人士是否否定了副主席和副总理；是否全国人民決定的。問題也不在于有些党员确实有点居功自傲，專断独行，影响了党外关系。这可以批評，党也正在要求大家帮助克服这个缺點。問題在于儲安平的歪曲事实，惡意污蔑，故意把党的领导和“党天下”混淆起来，根据他的論点，引伸下去，必然的邏輯，就只能是很消極的謬論。

揣摩一下右派分子的發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想把現状描繪成一幅乱七八糟的局面，拿共产党和国民党等量齐觀；是和國方的論者們一鼻孔出气，酒醉共产党統治之下沒有民主；是批體裁和党外人士（用儲安平的說法，是从全國的“才智之士”到“才子小民”）的感情，使他們有党無心，達到瓦解團結的目的。

以技巧論，儲安平在這方面是出類拔萃的。

特別惡劣的一手，从儲安平打稿積因，在發言會上，向毛主席和副总理提些意見”的題目这一個字看，就可以看出他用心之深。

問題当然不在于是不是可以向毛主席和副总理提意見。他們是全国愛戴的人民領袖，党的領導人，他們也是共产党员。——从这一角度来看，儲安平的“党员”一語，他們至今是神聖和受崇敬的对象，更何况于他們的日月之明，何足为民主人士提意見。問題的實質，是問党圍繞他們“將”共产党的“軍”，是陰險的向党進攻。有些工人同志对此表示深大的憤怒，是有理由的。“奉天到港”的考語，如果不是意在丑惡，那末去去次次我們这位儲先生了！

当然，提意見也有本意不坏而效果相反的，但儲安平的發言不屬於这一类，是显而易見的事。

我們應該严正的批評儲安平，但也應該諒解他。反社会主义的表现形态，也有种种不同，有惡劣的、有神士式的、有門戶見山式的、有类里斯刀式的，而越惡劣，危害性也越大。儲安平給了我們一点啟示，这是第一。現在有一种流行病，先是一种代病，叫“失魂”党员沒有本事，特別反对重慶輕才。才才，是好的；儲安平当然不失为“才智之士”，但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才智”用到了什么地方，起了什么作用。無治的事实說明：科提科提，立場問題畢竟还是知識分子最難过而必須过的一关，这是第二。儲安平的發言，在知識分子群中，須要有市場。要是誰和他發生冲突，甚至覺得潑我冷水，那就應該反省，赶快用点諒解心的功夫，看看彼此的共同点究竟在哪里。这是第三。

对我们大家，这一切都应当是有益的教訓。

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①

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就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②

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不克担任”，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1957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比较1957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出于无奈，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

① 徐铸成《风雨故人》第9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杭州。

② 《观察》第5卷第14期第7页。

第三节 《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旋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用傅斯年的说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①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同年。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是作为《观察》丛书出版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78页。

的,仅署真名的就有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的专门研究,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①

费孝通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②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能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的文章。他在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仍能在他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却很难再读到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文章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4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词典》、《游历者的眼睛》和《杂言——关于著作的》。

① 林元《碎布集》第397页。

② 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71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北京。

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这些文章远离政治随笔。储安平早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①

钱钟书在《观察》上只写了几篇简短学术随笔，他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特有的回避方式，常使人想到《围城》。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生活主题中。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是一个比较 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②

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钱钟书对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道：“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③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非常令人尊敬。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同为江苏人，都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

① 《观察》第2卷第1期。

② 《钱钟书研究》第2辑第32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北京。

③ 杨绛《干校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

儲安平長子儲望英

反对儲安平反动言行

【本報訊】儲安平的長子儲望英写信給本報，表示反对儲安平的反动言行，来信原文如下：

文匯報編輯部負責同志：

我是儲安平的長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員返家。

儲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論發表以后，已受到全國人民的严詞駁斥。我身为革命軍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領袖的謬論。

在報紙上已揭發了他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証明他这种惡毒思想是長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圖借用光明日报作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認清了他的反党面貌。

我要給儲安平先生进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馬，好好地傾听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于人民。

儲望英 (0, 26)

上图：1957年儲安平長子給《文匯報》的信

下图：儲安平和他的孩子



育和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欧美。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1957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最为人熟悉,也最有悲剧色彩。

第四节 《观察》撰稿人简况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学历	留学	专业	1949年	1957年
卞之琳	1910~2000	江苏海门	北京大学	英国	诗人	大陆	
王芸生	1901~1980	天津静海	新闻			大陆	
王迅中							
王贻愚	1906~1997	福建福州	清华大学		政治学		
伍启元	1912~	广东台山	沪江大学	英国	法学	大陆	
任鸿隽	1886~1961	浙江吴兴	清华大学	美国	植物学	大陆	
吕复	1887~1951	河北逐鹿	日本	社会学	大陆		
何永佶	1902~1966	广东番禺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大陆	
沈有乾	1900~	江苏吴县	清华大学	美国	哲学	大陆	
吴世昌	1908~1986	浙江宁海	燕京大学	英国	文学	英国	
吴恩裕	1909~1979	辽宁沈阳	清华大学	英国	政治学	大陆	
吴泽霖	1898~1990	江苏常熟	清华大学	美国	民族学	大陆	
李纯青	1908~1990	台湾台北	中央政校	日本	新闻	大陆	
李浩培	1906~1997	上海市	东吴大学	英国	国际法	大陆	
李广田	1906~1968	山东邹平	北京大学		文学	大陆	
沙学浚	1907~1998	江苏泰州	中央大学	德国	地质	台湾	
周子亚	1911~	浙江杭州	中央大学	德国	政治学	大陆	
周东郊	1907~1978	浙江绍兴	东北大学		历史	大陆	
宗白华	1897~1986	江苏常熟	同济大学	德国	哲学	大陆	
季羨林	1911~	山东临清	清华大学	德国	语言学	大陆	
胡适	1891~1962	安徽绩溪	清华大学	美国	哲学	台湾	
胡先骕	1894~1968	江西新建	清华大学	美国	植物学	大陆	

柳无忌	1907 ~ 2002	江苏吴江	清华大学	美国	文学	美国	
徐盈	1912 ~ 1996	山东德州	金陵大学		新闻	大陆	右派
孙克宽							
马寅初	1882 ~ 1981	浙江绍兴	北洋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大陆	
高觉敷	1896 ~ 1993	浙江温州	香港大学		心理学	大陆	右派
许君远	1905 ~ 1962	河北安国	北京大学		新闻	大陆	右派
许德珩	1890 ~ 1990	江西九江	北京大学	法国	政治学	大陆	
陈之迈	1908 ~ 1978	广东番禺	清华大学	法国	政治学	台湾	
陈友松	1899 ~	湖北京山		美国	教育学	大陆	
陈衡哲	1893 ~ 1976	湖南衡阳	清华大学	美国	世界史	大陆	
陈瘦竹	1909 ~ 1991	江苏无锡	武汉大学		戏剧	大陆	
陈维稷	1902 ~ 1984	安徽青阳		英国	纺织	大陆	
夏炎德	1911 ~	上海市	暨南大学	英国	经济学	大陆	
曹禺	1910 ~ 1996	天津市	清华大学		戏剧	大陆	
梁实秋	1902 ~ 1991	北京市	清华大学	美国	文学	台湾	
张印堂	1902 ~	山东泰安	燕京大学	英国	地理学	大陆	
张沅长	1905 ~	上海市	复旦大学	美国	文学		
张忠绶	1901 ~ 1977	湖北武昌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美国	
张东荪	1886 ~ 1973	浙江杭州		日本	哲学	大陆	
张德昌	1907 ~	河南林县	清华大学		政治学	美国	
笪移今	1909 ~	江苏句容			经济学	大陆	
黄正铭	1903 ~ 1973	浙江海宁	中央大学	英国	法学	台湾	
郭有守	1900 ~	四川资中		日本	教育学	台湾	
章靳以	1909 ~ 1959	天津市	复旦大学		文学	大陆	
冯至	1905 ~ 1993	河北涿州	北京大学	德国	文学	大陆	
冯友兰	1895 ~ 1990	河南唐河	北京大学	美国	哲学	大陆	
程希孟	1900 ~ 1976	江西南城		美国		大陆	
曾昭抡	1899 ~ 1967	湖南湘乡	清华大学	美国	化学	大陆	右派
傅雷	1908 ~ 1966	上海南汇	持公大学	法国	文学	大陆	右派
傅斯年	1896 ~ 1950	山东聊城	北京大学	美国	心理学	台湾	
费孝通	1910 ~ 2005	江苏吴江	清华大学	英国	社会学	大陆	右派
杨刚	1905 ~ 1957	湖北沔阳	燕京大学	美国	新闻	大陆	
杨绛	1911 ~	江苏无锡	清华大学	法国	文学	大陆	

杨人楩	1903 ~ 1973	湖南醴陵	北师大	英国	历史	大陆	
杨西孟	1900 ~	四川江津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大陆	
叶公超	1904 ~ 1981	广东番禺	清华大学	英国	文学	台湾	
雷海宗	1902 ~ 1962	河北永清	清华大学	美国	世界史	大陆	右派
赵家璧	1908 ~ 1997	江苏松江	光华大学		文学	大陆	
赵超构	1910 ~ 1991	浙江瑞安	中国公学		新闻	大陆	右派
潘光旦	1899 ~ 1967	江苏宝山	清华大学	美国	社会学	大陆	右派
蔡维藩	1898 ~ 1971	江苏南京	金陵大学	美国	世界史	大陆	
刘大杰	1904 ~ 1971	湖南岳阳			文学	大陆	
楼邦彦	1912 ~ 1979	浙江鄞县	清华大学	英国	法学	大陆	右派
钱能欣	1917 ~	浙江湖州	北京大学	法国	国际法	大陆	
钱清廉							
钱歌川	1903 ~ 1990	湖南湘潭		英国	文学	美国	
钱端升	1900 ~ 1990	上海市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大陆	右派
钱钟书	1910 ~ 1998	江苏无锡	清华大学	英国	文学	大陆	
鲍觉民	1909 ~ 1985	安徽巢县	中央大学	英国	地理学	大陆	
戴文赛	1911 ~ 1979	福建漳州	燕京大学	英国	天文学	大陆	
戴世光	1908 ~ 2000	天津市	清华大学	美国	统计学	大陆	
戴镛龄	1913 ~ 1998	江苏镇江		英国	文学	大陆	
韩德培	1911 ~	江苏如皋	中央大学	美国	法学	大陆	右派
萧乾	1910 ~ 1999	北京市	燕京大学	英国	文学	大陆	右派
萧公权	1897 ~ 1981	江西泰和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台湾	
顾翊群	1900 ~	江苏淮安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台湾	

第一、从《观察》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上看,大体有两个年龄段,第一个是以胡适、马寅初、许德衍、任鸿隽、傅斯年、张东荪、萧公权、冯友兰、胡先骕等一批 19 世纪末出生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占《观察》撰稿人的 10% 左右。在《观察》时期除个别人外,这批人不是最活跃的。

第二、《观察》撰稿人主要是 20 世纪初出生的人,具体时间约为 1900 ~ 1910 年前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 40 年代最为活跃,因为从年龄上看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在当时都在 50 岁以下,其中



寻找储安平

邓加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本关于储安平的报告文学集

储安平与《观察》



一本回忆储安平的文集

多数人是 不满 40 岁,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龄时期。

第三、从《观察》撰稿人的受教育程度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主要范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

第四、从留学背景看,《观察》撰稿人除个别人是留日的以外(约有 3 人),其余都是留学欧美的。

第五、从《观察》撰稿人的职业分布看,除了个别人为政府官员如陈之迈、郭有守等人外,大部分是当时名牌大学的教授。从专业分布看除任鸿隽、戴文赛、胡先骕、曾昭抡等少数从事自然科学外,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其中尤其以从事经济、法学、社会学、新闻和文学的为多。

第六、1949 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人离开大陆先后到了美国和台湾,其中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大陆。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离开大陆的条件,但他们没有离开。《观察》的撰稿人中有像杨刚、徐盈、李纯青和范长江这样的共产党人,但多数是无党派人士。

第七、1957 年夏天,《观察》撰稿人中的多数被打成了“右派”。到了 1966 年,《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曾昭抡等就已先后离世。



附录一

《客观》1~17期目录

说明：《客观》周刊1945年11月11日在重庆创刊，出至17期后停刊。发行人张稚琴。储安平主编。编辑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设有两个副刊，一为“副叶”，一为“珊瑚”，“副叶”由聂绀弩编辑。“客观一周”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执笔，后5期由吴世昌执笔。储安平只主编了前12期。从刊物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方面看，《客观》确是《观察》的前身。本目录据重庆图书馆历史部所藏《客观》辑录。

第一期（中华民国34年11月11日出版）

我们的立场本社同人

客观一周

第二次沦陷

一团糟

一团糟的责任问题

用人

组织与力量

阎锡山

国家的活力
美国人和中国官

专论

论国共会谈纪要
远东三十年
论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之设立

钱清廉
张德昌
陈维稷

译论

美国的乐观主义与欧洲的悲观主义

R·Coudenhove-Kalergi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张大千与中国绘画
约翰·曼黛维爵士的新游记

郭有守
余敬

英国采风录(长篇连载)

王后

储安平

现代中国工建人物

钱子宁

徐盈

各地通讯

锦城三秋

柳莺

经济一周

物价的回涨金融市场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命令你们停战
暴发户破落子弟与书生

紺弩
何莱

从南京寄
半明灯下随笔
孔聂断简

庄 涌
杨大渭
聂 子

珊瑚·副刊之二

珊瑚坝往来
澹园随笔
北平航简
海外野谈
七十辞寿

南 欧
彭国栋
光 亚
晓 朗
简 翁

编辑后记

第二期（中华民国 34 年 11 月 17 日出版）

客观一周

诺言与兑现
理论与事实
国民党的病证
进步与刺戟
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
某一种结论
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
政治上的责任心

专论

反对内战
评最近的工业复员工作
世界和平与理想主义

吴世昌
李紫翔
杨人榘

科学丛谈

废物和塑质工业

陈维稷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汉姆烈特歌剧参观记

李慕白

误人父兄

聂绀弩

儿童·妇女·家庭

谈拒食

钱 蕤

长篇连载：英国风采录（二）

国会·上院·下院

储安平

经济一周

内战声中的工业界

笄移今

各地通讯

西安零简

王 笙

副叶·副刊之一

忆旧游

冯 至

何思源

谈 庐

放碗不放筷子

今

我的敌手

康尽译

你该回去了

绀 弩

珊瑚·副刊之二

重庆街头

南 欧

我做过翻译官

李 光

民不堪命

犀

原子弹
海外野谈
忠奸自古同冰炭

郑曼青
晓 朗
犀

编辑后记

第三期（中华民国 34 年 11 月 24 日出版）

客观一周

自相矛盾
不近人情
权力
事半功倍
美人对华观感的动摇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

专论

思想复员论	吴世昌
一个世界·两个算盘	张德昌
论取才	周子亚

译论

论英格兰银行国有	C·D·H·Cole
----------	------------

科学丛谈

鸡毛·花生和人造纤维	陈维稷
------------	-----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马思聪在音乐上的成就	郭有守
送别	李慕白

儿童·妇女·家庭

谈儿童的遗尿

钱 蕓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三）

内阁·首相

储安平

经济一周

恐慌的根源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厌战的心理

云 彬

谈嵇康

文郁芳

欣闻秦似未死

绀 弩

城

向 真

希特勒的诗

晏之齐

珊瑚·副刊之二

我是一个播音员

斯 超

美国的大兵谈上海

南欧译

两位贝多芬

沙 仑

诗

稚 琴

编辑后记

第四期（中华民国 34 年 12 月 1 日出版）

客观一周

共产党的前途

共产党与国家

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
共产党与民主自由

专论

- | | |
|------------|-----|
| 政治协商会议之展望 | 钱清廉 |
| 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 | 吴恩裕 |
| 莫做西班牙第二 | 孙斯鸣 |

人物

- | | |
|-------|-----|
| 爱丁顿教授 | 戴文赛 |
|-------|-----|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 | | |
|-------|-----|
| 诗与戏剧 | 陈瘦竹 |
| 南国的艳丽 | 谭燕 |

各地通讯

- | | |
|--------|-----|
| 模范省的心脏 | 柳因 |
| 收复后的上海 | 申不平 |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四）

- | | |
|---------|-----|
| 贵族·贵族社会 | 储安平 |
|---------|-----|

经济一周

- | | |
|----------|-----|
| 经济政策在哪里？ | 笄移今 |
|----------|-----|

读者投书

- | | |
|---------|-----|
| 为山东灾民呼吁 | 王新仑 |
|---------|-----|

副叶·副刊之一

- | | |
|------------|----|
| 从封神演义扯到弗朗哥 | 绀弩 |
|------------|----|

织者
毛子坐洋车
从某地寄
比萨斜塔
感谢与寄慰

韦 华
叶 钊
纬 亭
晏之齐
紺 弩

珊瑚·副刊之二

汽车
我是一个助产师
美国大兵的诗
A专员
美国最流行的歌曲

革 木
惠 玲
南欧译
陈 冬
清 清

编辑后记

第五期（中华民国 34 年 12 月 8 日出版）

客观一周

蒋主席的新演词
人民的才干
交通启蒙运动
耕耘方法的改革
卫生状况
住宅问题

专论

是我们自省的时候了
昆明学生事件
论美国的倾向
动荡的南洋

陈衡哲
青 水
吴希之
林 超

科学丛谈

气候与人的生命

陈维稷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我的诗和字

柳亚子

买菜的艺术

吴伯威

书评

经济自由主义的转变

伍启元

儿童·妇女·家庭

谈儿童的不肯安眠

钱 蕪

现代中国工建人物

陶桂林

徐 盈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五)

大宪章·自由主义

储安平

经济一周

伟大的经济机会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文人与画

郭良夫

用不着警惕

绀 弩

从上海寄

白 熊

强弓握在强者手

余所亚

小感

莫 耳

解左劝的人

看 客

珊瑚·副刊之二

马歇尔和派尔

桂林短简

女学生的笑和哭

重庆的音乐厅

谭米与邓妮

南 欧

岩 若

步 芳

公 道

燕子译

第六期（中华民国 34 年 12 月 15 日出版）

客观一周

这一周

昆明学生惨案

事实与雄辩

政府对昆明惨案的处理

平津大捕汉奸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专论

技术革命——经济建设主要目标之一 伍启元

新时代的人性观与教育 陈友松

历史研究与实际政治 杨人榭

科学丛谈

太阳光与原子能 戴文赛

译论

苏联重返亚洲 J·B·Powell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自然环境对于英国文艺之影响 戴镛龄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六)

种族·外族入侵遗留之影响

储安平

经济一周

敌伪资产接收的分歧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无用无所不用

耿庸

好人与坏人

朱希

饥饿的启示

淡严

东乡和严复

晏之齐

木刻

陈烟桥

珊瑚·副刊之二

可贵的真纯

南欧

客岁之冬

晓朗

大姐姐的信箱

谈友谊

编辑后记

第七期(中华民国34年12月22日出版)

客观一周

敬告马歇尔元帅

统一

民主

自由

政府改组

资产阶级与自由分子

特译

杜鲁门总统声明本社译文

(附本社译文与中央社译文之主要不同之处)

专论

社会革命——经济建设主要目标之二

伍启元

猩猩与人

高觉敷

理想与实际的对话

戴文赛

世界和平与中国前途

周子亚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论戏剧中的民主倾向

陈瘦竹

近代的音乐与绘画的关联

孟紫明

儿童·妇女·家庭

谈家庭的困难

涧清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七)

性格·风度

储安平

经济一周

危机的新趋势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德政

周元

从“裙带关系”说起

金春生

伤风楼自语

紺弩

小号兵
普希金的惨劫

言 迈
晏之齐

珊瑚·副刊之二

圣诞歌的故事
遥寿简翁
圣诞快乐
侧面新闻
平安夜

燕 子
易君左
南 欧
李 光

大姐姐的信箱

编辑后记

第八期（中华民国 34 年 12 月 29 日出版）

客观一周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
马歇尔来华与中国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

专论

中国必须办一次真正的选举
建设国家与建设文化
论重划省区
中国现局剖视
法律教育之改进与加强

张东荪
伍启元
吕 复
卫 真
李浩培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萧邦与钢琴曲

戴文赛

乔治·桑德与萧邦

端木琦

儿童·妇女·家庭

如何赢得一个丈夫

G·B·Newcomb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八）

雾·雨·潮湿

英国采风录序

储安平

储安平

各地通讯

上海的七十六号

晓 亚

经济一周

将变的前夕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毛词”溯源

沁园春

毛词解

毛词和章

犀

毛泽东

绀 弩

柳亚子 易君左 等

珊瑚·副刊之二

游美观感

珍贵的友谊

圣诞歌的故事

星期音乐会

“真正的光荣”

似 有

R·P

燕 子

南 欧

编辑后记

第九期（中华民国 35 年 1 月 5 日出版）

客观一周

又是一年开始

以万变应不变

假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建议，

即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专论

我们不敢奢望！

平 情

中国文化的出路

伍启元

农业改革与工业化

陈劲寒

赢得战争与赢得和平

孙斯鸣

学术讨论

关于奥斯汀主权说的讨论

萧公权 吴恩裕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论刘开渠

郭有守

各地通讯

雾成都

柳 因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九）

乡村生活

储安平

经济一周

这该是 1946 年的希望

笮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韩青天

山煞

冷云斋杂札

帽子

绀弩

LK

李芳烁

耳耶

珊瑚·副刊之二

去你的

吊昆明师生

我在保山诸葛营

怀古感今

南欧

孙荪荃

巨川

金春生

大姐姐的信箱

谈恋爱

编辑后记

第十期（中华民国35年1月12日出版）

客观一周

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内战停止

谈人力车的废止

专论

论政治协商会议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

中国的麻症

吴世昌

伍启元

许汝祉

人物

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上) 吴恩裕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叔曼与克莱拉 戴文赛

梅迪生哀词六章 任叔永

书评

陈著中国政府 钱清廉

各地通讯

贵阳近事 哲先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十)

女子·结婚·家庭 储安平

经济一周

建设准备年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论发脾气 绀弩

药用植物 蔡壬侯

袁世凯 耿庸

珊瑚·副刊之二

林园的除夕盛会 罗圣琴

没有忘记 朔望

枪花可以休矣 张真

民主的真义 清清

大姐姐的信箱

编辑后记

第十一期（中华民国 35 年 1 月 19 日出版）

客观一周

从停战说起

军队如何裁减

蒙古新疆之类

南部新声

专论

中国人与英国人

储安平

目的物的要求值

高觉敷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下）

伍启元

人物

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下）

吴恩裕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英国文艺史上翻译时代的翻译风气

戴镛龄

儿童·妇女·家庭

谈儿童的偷窃行为

钱 蕓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十一）

女子·结婚·家庭

储安平

经济一周

保护国民经济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谈辈分

绀弩

从巴东寄

EB

春天的希望

沈慧

皇帝的子孙

耳耶

珊瑚·副刊之二

音乐欣赏

贺师武

台湾来鸿

杰民

小国三马力诺

古光译

一月十日

南欧

美国去年最畅销的书

大姐姐的信箱

编辑后记

第十二期(中华民国 35 年 1 月 26 日出版)

客观一周

停战令下,战仍不停

协商成就

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

告别读者

专论

一种精神两般适用

潘光旦

- | | |
|----------------|--------------|
| 现代政治思潮之趋势 | 吴恩裕 |
| 论国家财政改革 | 朱伯康 |
| 中国人与英国人(下) | 储安平 |
| 人物 | |
| 轴心国家的五大失策 | H·S·Commager |
|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 |
| 画家吴作人 | 郭有守 |
| 我的妻子杀了三个人 | A·GARR |
| 现代中国工建人物 | |
| 恽震 | 徐盈 |
| 长篇连载:英国采风录(十二) | |
| 女子·结婚·家庭 | 储安平 |
| 经济一周 | |
| 令人着急的问题 | 笄移今 |
| 副叶·副刊之一 | |
| 从宋代杂戏说到“法统” | 申右芷 |
| 我受军训来 | 庐墟 |
| 萧红一忆 | 绀弩 |
| 舆论 | 耿庸 |
| 发表欲望论 | 骆宾基 |
| 珊瑚·副刊之二 | |
| 抗战遗音 | 陈芸苍 |
| 中国的贝多芬 | 公道 |

嘉陵小品

王锐

大姐姐的信箱

第十三期(中华民国35年2月9日出版)

客观一周

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

各案内容检讨

各党各派的贡献

一个建议

专论

要让人民站起来

平情

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

吴世昌

改进中国政治的两个问题

吴恩裕

谈政争

胡经纬

科学丛谈

地球上最丰富的金属——铝

雷克译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宗白华

尹瘦石的画和人

柳亚子

创作

场长先生

蔡壬侯

各地通讯

燕京大学蒙难和收复经过

厚用

经济一周

营民营之争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上会

义务与休息

小孩与山羊

漫画

夜记

灯

绀 弩

张 真

慕 秋

汪子美

稻梁红

稻梁红

珊瑚·副刊之二

人的教育

欣赏的联想

芜湖仍在混乱中

月亮和臭虫

离婚日多

冯南欧

洪 波

世 泰

燕 子

清 清

大姐姐的信箱

第十四期（中华民国 35 年 2 月 16 日出版）

客观一周

联合国会议的几个难题

一个丑剧

一个惨案和另外一个丑剧

克里米亚会议的秘密协定

专论

德国与欧洲和平的再造

张致远

- | | |
|--------------------|------------------|
| 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 | 吴恩裕 |
| 说党 | 张世禄 |
| 教育的自由与统治 | 黄金鳌 |
|
 | |
| 工业技术 | |
| 经济燃烧与生火夫 | 孙其铭 |
|
 | |
|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 |
| 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 | 宗白华 |
| 法轮 | W·G·mayne 作 王海伯译 |
|
 | |
| 民俗资料 | |
| 广西长毛的生活与礼俗 | 陈志良 |
|
 | |
| 经济一周 | |
| 扶植中小工业 | 笄移今 |
|
 | |
| 副叶·副刊之一 | |
| 镜子 | 东方人 |
| 诗人的道德观 | 萧凡 |
| 漫画 | 汪子美 |
| 陶潜与吕伯奢 | 郁天 |
| 勋章和荣誉 | 商灵雨 |
|
 | |
| 珊瑚·副刊之二 | |
| 名词翻译之难 | 孟紫明 |
| 新闻自由和记者 | 晓郎 |
| 诗中有剧 | 依帆 |
| 实行第一 | 南欧 |
| 侧面新闻 | 燕子 |

第十五期（中华民国 35 年 3 月 2 日出版）

客观一周

东北问题

问题的表面化

学生游行及其他

要东北·也要民主

专论

动荡的国民党

储安平

戴高乐与法国之自由统一

吴本中

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进言

守伯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福斯德——美国的歌曲作家

戴文赛

图书版本

搜集鬻书记

吴恩裕

童话短剧

天亮了

聂绀弩

各地通讯

春到长河

冯子英

今日的江南

罕明

经济一周

澎湃全国的黄金潮

笄移今

副叶·副刊之一

六鸥退飞

断想

医治病方

文坛三斑

摩登

绀弩

稻梁红

耿庸

斯璜翦

商均

珊瑚副刊之二

二胡“胡”考

DDT有助农人

杂感

诗

夫妻之间

最理想的妻子

紫明

燕译

布亚

澄宇

清清

第十六期（中华民国 35 年 3 月 9 日出版）

客观一周

爱国运动及其插曲

东北问题及其谣言

专论

认识英国

廉洁政治之路

美国对于中国的兴趣

军队与民主

管制日本的根本问题

吴希之

宁恩承

高白非

张景文

林焕平

科学丛谈

新星与原子能

戴文赛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上)

吴世昌

廖计百先生墓碑铭

柳亚子

读者投书

我们的呼声

汉中青年军工二连石勃瑜执笔

各地通讯

平津冬景

何 韜

北方春讯

何 韜

杭州花絮

管希雄

副叶·副刊之一

闲笔

绀 弩

糊涂人

田 才

道不是因为寂寞

稻梁红

偶拾三章

仲 子

蟋蟀

稻梁红

珊瑚·副刊之二

拿出事实来

南 欧

香港脚

麦 丹

“猛人”和“他的四周”

慰 冰

第十七期 (中华民国 35 年 3 月 21 日出版)

客观一周

国际条约的滑稽性

中苏谈、判的形势

又想起了五四运动
“真相至今未明”
友好条约的后果之一

专论

印度支那半岛华侨的帮派
与伍启元先生论发展国家经济
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

连升
洪铭声
莫飏

译论

论法德音乐

罗曼·罗兰作 白桦译

青年园地

谈今日大学生中的男女社交

楼学礼

科学丛谈

人类的将来

雷克译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辽鹤哀音
点绛唇——题冀野辽鹤哀音
保罗·雷菲尔跨上了马鞍

庐前
于佑任
朗法罗作 石炭译

边疆风光

青海塔儿寺庙会观光记

陈白

各地通讯

兰州掠影
双鞭抽打的长沙

葛宁真
伍丁

副叶·副刊之一

“文化”·手枪·征求伴侣和精神的花柳病患	耿庸
示斗筲之器	申右芷
王止舟诗集序	绀弩
情禅	万平

珊瑚·副刊之二

我是自由主义者	圣琴
春天	东山
回到北平故乡	斯超
分量真多	孟紫明

附录二

《观察》1~6卷作者索引

说明:

- 一、本《观察》1~6卷作者索引系据北京图书馆所存合订本辑录。
- 二、《观察》合订本共分6卷,每24期为一卷。其中第5卷出至18期停刊,第6卷为半月刊,出至14期后改刊。
- 三、《观察》1~4卷均编有该卷总目及作者索引。本索引均据此辑录。第5卷无作者索引,此次辑录为笔者重新编排。第6卷无作者索引,亦系重编。
- 四、《观察》每期辟有“页尾”专栏、刊载一些简短小品、诗词、启事、编者、读者信函等,每卷总目未列,因此未列。
- 五、《观察》通讯专栏,多以本刊特约记者、读者投书署名,也未列。

《观察》第1卷作者索引

作者	题目	期数
天行	人与文	24
卞之琳	山水·人物·艺术	12
	山野记行	7
王芸生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	1
王庆源	战争与和平	23

朱东润	我从泰兴来	6
伍启元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	12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	2
	新时代与新时代的人文科学	4
	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8
	现代财政动向与中国财政政策	24
全慰天	求生与求胜	18
吴世昌	谁能替人民说话	4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5
	中国需要重建权威	8
	关于“军与民的社会地位”	16
	论国体问题	18
	论美军事件	21
	和谈一年	24
吴恩裕	家庭关系 政治关系 民主政治	4
李侠文	动荡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5
李纯青	战从义·政从仁	8
李浩培	英国司法制度	5
	何德奎案	15
阮春芳	成见的根源	18
李广田	文学的价值	3
	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	12
李慕白	莎翁戏剧的历史背景	22
李澈庐	以民主缔造统一	12
	服从社会与意志社会	19
沙学浚	是否移都北平?	17
味 橄	战败后之日本	3
宗白华	艺术的空灵和充实	6
	悲剧世界之变迁	8

周子亚	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 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23
周东郊	新疆变乱记略(专辑)	14
周绶章	提得起·放得下	7
	论神话政治	21
周钟歧	论革命	22
季羨林	谈翻译	21
胡先骕	未知之人类	3
	中美英苏之关系及世界和平	5
	思想之改造	7至9
	经济之改造	20至23
马寅初	土地税	18
高名凯	中国语言之结构及其表达思想之方式	11
	语言的宗教	16
孙克宽	逆流与歧途	13
	人心·国是·现状	20
夏炎德	论中美经济关系的前途	19
高觉敷	从对比到统一	2
	社会性的统一	5
陈力	果园文化	20
陈友松	时代的分析	3
	新时代的教育宗旨	10
陈之迈	粮食的国际分配	1
陈衡哲	“你是不是基督教徒?”	11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义	13
陈瘦竹	论排场戏	12
	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	4
	戏剧与观众	10
陈志让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	22
陈柏心	论省自治	15

郭有守	进展中的联合国文教局	17
许君远	留学制度·留学生	5
张 锐	论行政的无能	17
张印堂	英美未来可能的战略联防线	2
	定都问题	17
张东荪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	1至6
	士的使命与理学	13
张义昌	从美国看中国(太平洋通讯)	22
张道真	西洋诗之音乐性	11
	谈玄诗	23
陶孟和	大战后的美国	12
笄移今	中国经济危机的出路	9
	论商业银行的前途	20
庄智焕	如何走上民主建设之路	6
	中国政治上的四种矛盾	11
梁实秋译	斗争中的莎士比亚	15至19
梁瓿第	美国教师的贫困	13
冯 至	沙龙	12
冯友兰	论知行	1
	再论知行	6
傅斯年	内蒙自治问题	22
杨 刚	烦恼的美国人的烦恼	4
	晦明初冬	21
杨西孟	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	3
邹文海	民主政治与自由	13
雷海宗	和平与太平	9
廖世承	个己的产生	8
潘光旦	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	2
	军与民的社会地位	9
	派与汇	15至19

	荀子与斯宾塞论解蔽	21
楼邦彦	“自由·平等·博爱”的再生	20
	论官吏的民权	23
刘朝阳	物理战争	24
钱 蕓	性格及职业兴趣的遗传问题	15
钱能欣	巴黎会议成就了什么?	15
蔡壬侯	林溪和地球	7
	英国人和癌症的抗争	16
蔡维藩	二十一国和会	1
戴文赛	原子能研究的发展经过	4
	牛郎织女	6
	孟德逊——最幸运的作曲家	9
	玄武湖上的秋月	10
	工作与娱乐	19
戴世光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	10
戴镛龄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5
	福哉玛利亚	13
	柏拉图放逐诗人辩	20
储安平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1
	失败的统治	3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11
	论上海民乱	16
	论张君劢	19
	辛勤·忍耐·向前	24
谢扶雅	敬告社会贤达	24
简贯三	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7
韩德培	我们所需要的法治	10
	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	24
萧 乾	给英国老约翰	7
萧公权	说民主	9

	圣教与异端	10至12
罗忠恕	学术自由与文化进展	12

《观察》第2卷作者索引

作者	题目	期数
丁芸	新疆观感录	22·23
王芸生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10
王遵明	生铁焦煤·不可运日	15
	钢铁在苏联	23
王洁非等	我们对于当前时局之建议(文摘)	8
北大政治系学生	对于钱端升先生所拟“联立之路”的意见	8
北平十三教授	保障人权(文摘)	2
史立常	人类的世界观念	6
伍启元	从世界潮流论中国出路	7
全慰天	记陈达教授	8
吴元黎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3
	现代经济思潮的趋势	9
何永信	从天下国家到地缘国家	19
	从印度分治说到中国前途	20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捷克	22
吴世昌	论党的职业化	2
	论台湾的动乱	4
	从美苏说到国内	6
	论政府的改组	9
	写在五四的前夕	2
	论和平问题	16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文摘)	18
	从北塔山事件说起	19

	言论自由的自律	21
	论“民主国际”	22
	试论美国的“中韩调查团”及我国的反应	24
李浩培	法治实行问题	12
李纯青	台湾民变真像钩沉	4
李广田	滇谣小记	9
李慕白	圣诞夜	2
	约会	3
	冬天里的夏天	4
	海滨	6
	误会	7
	一曲难忘	8
	樊龙	11
	墓	12
	复活	17
	归来	18
	爱与死	19
沙学浚	与梁漱溟先生论“国土太大”及其利弊	13
任鸿隽	留美学界的几个问题	11
	追念顾临先生	14
	为本届大学毕业生进一言	20
金隄	一个冬天的黄昏	24
金克木等	我们对于学潮的意见(文摘)	15
周东郊	北塔山事件·新蒙边界·新疆问题	19
季羨林	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1
	怜人	5
周绶章	谈“孔家店”	10
	疯狂了的中国	16
阿尔敏沙林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	11
胡先骕	在美国西部之世界斧与万县之水杉	13

施若霖	论中国的土地改革	21
施复亮	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9
马寅初	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文摘)	2
倪正和	与潘光旦先生论文化书	16
袁昌英	谈谣言	13
夏炎德	论亚洲与远东的经济重建	18
张锐	论中国的“官僚制度”	7
张述祖	习尚与价值判断的标准自由的心理	12
张东荪	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	6
	和平何以会死了(文摘)	6
	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文摘)	6
	狱中生活简记	13至17
	为中国问题忠告美国	20
张奚若	时局答客问(文摘)	3
张啸虎	我对大公报的看法	5
	论风度	20
陈彦	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探索	24
陈友松	世界各国教育普及之比较观	17
陈旭麓	中国向哪一条路走	21
陈孝禅	养士教育的穷途	24
陈衡哲	“主敬”是迂拙吗?	3
	民主园中的嘉木与恶草	5
	平衡生活的一个方案	10
	关于自由思想分子(通讯)	12
陈瘦竹	论悲剧的人生观	20
冯大麟	期待东方的“文艺复兴”	21
笪移今	物价往哪里去?	5
	评方显庭先生的经济观点	20
庄智焕	从黄金风潮论经济对策	1
梁漱溟	树立信用·力求合作	1

	关于“中国的政局”(通讯)	4
	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	5至7
	从中国的家庭说起	11·12
	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	15
高觉敷	从心理学观点解释中国悲惨的现状	18
傅雷	我们对于美苏关系的态度(文摘)	10
	所谓亲帝反苏	24
傅孟真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1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摘)	1
	宋子文的失败(文摘)	1
傅统先	以教育救中国	12
费孝通	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10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11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13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15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16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文摘)	16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17
	蛮一点,孩子!	20
	道德上有个毒刺	21
	负了气的出门	22
贺昌群	中国历史的悲剧	22·24
黄炳坤	社会运动的口号问题	15
万光	琉球归还中国	24
雷海宗	女妇·女权	2
杨刚	动荡的国际现状与美国最近的外交倾向 (纽约通讯)	6
	从杜鲁门主义到马歇尔方案(纽约通讯)	22
杨绛	随铁大少回家	10
杨人楩	国民党往何处去?	3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11
杨光时等	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和对策	21
杨西孟	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	17
虞愚	哲学精神的价值	7
葛思恩	新闻自由的低潮	16
樊弘	教育莫忘群育·读书莫忘救国	20
蔡壬侯	英文的中国化	4
	灰尘吸入症	11
	我们为什么像人	18
蔡维蕃	美苏间的恐惧	8
潘光旦	人文科学必须东山再起	8·9
刘英臣	试论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于费孝通先生	23
刘迺诚	现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几种原则	5
	论政府改革	8
郑林庄	经济正义于社会安全	3
	从经济立场看美苏关系	14
邓嗣禹	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	19
	从粤汉路惨案看中国的公共事业	24
楼邦彦	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	13
	张群院长的曲解	15
钱能欣	德国问题与欧洲和平(巴黎通讯)	13
钱端升	教师与进步	1
	世界大势于中国地位	3
	惟和平始得统一论	4
钱钟书	说(回家)	1
戴文赛	鸡蛋直立的故事	2
	我们的太阳	3
	光度常常变化的星	15
	陨星与流星	19
戴镛龄	论伍光建先生的翻译	21

储安平	中国的政局	2
	施用闷汗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9
	三百二十三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12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13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14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	14
	读孙科谈话	18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22
	艰难·风险·沉着	24
钟伯平	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	17
简贯三	从政治·经济·法理分析	
	金潮之因果与处理	1
萧公权	论教育政策	2
魏登临	关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新宪典	10
严仁赓	我们对于时局的几点认识	23
LEO RISSIN	魏德迈来华使命	23
N·EFFER	细看中国	18
THE WORLD REPORT	英国工党政府对于民营事业的管理办法	9
W.B.YEATS 等	译诗五首	23

《观察》第3卷作者索引

作者	题目	期数
丁 骥	论科学研究的动机	9
王 琦	杜蒲及其漫画	9
王铁崖	论立法院与条约权	2
王绳祖	法国革命史	1
	如何约束日本的金属工业	8
	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	8

王 泽	写在“为中国农业试探一条出路”的后面	6
方显廷	远东经济委员会与中国	20
田汝康	千言万语只为煤	4
	钢铁国营议案与工党内部困难	9
	做“要人”得像个“要人”的样子	15
	干部之累	23
史超礼	黑白分明	5
	美国的机器	5
	柴那门的机会	18
	雏形中国	21
朱自清	论朗诵诗	1
	论雅俗共赏	11
	论不满现状	18
朱本源	论尊孔与民主的矛盾	10
余才友	梅月涵与清华大学	13
	潘光旦的人文思想	17
	陆志韦及其研究工作	19
吴 晗	一多遗集	12
吴之椿	大选与时局	4
吴世昌	论当前的政局与美国对华政策	5
	从中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	18
吴恩裕	论人性与私产	4
	国家与道德	7
	自由乎？平等乎？	12
	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	15
	一个历史的教训	17
	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	22
吴景超	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	3
李克佐等	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	3
李孝友	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19

李恭宇	地方财政往何处去?	6
李纯青	对日和约政治问题	6
	论琉球归属问题	12
李理黄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13
李烛尘	论中纺让给民营的方法	1
何 达	令人醉的诗和令人醒的诗	7
谷春帆	从民主到帝国	10
芮 沐	行宪前夕的一个违宪之法	22
宗白华	略论文艺与象征	2
金克木	创造的统一	8
	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	12
季羨林	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7
周子亚	国际公法成案研究	8
周炳琳等	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	11
周东郊	第二转型期的新疆	6
周叔厚	论竞选费用应有限制	14
	论立法院内应设置“立法顾问委员会”	21
胡慎明	一个参加竞选的人的自白	4
胡先骕	生物学战争	5
胡庆钧	论保长	17
施复亮	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22
徐中玉	论勇敢的表现	15
	精工与草率	23
徐述纶	我对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意见	2
	“闻一多的道路”	3
袁 方	论商贾	19
	生育制度	24
袁国弼	一个农业工作者的自白与意见	24
凌 卓	莫泊桑给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10
	瑞士三咏	21

孙克宽	改进中国政治的几个问题	13
陈 达	人口普查与技术人才	21
陈之迈	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13
陈序经	论发展学述的计划	17
陈振汉	论经济与政治	2
	当前几种经济急救方案效果的估计	2
陈衡哲	写在“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的前面	3
陈梦家	论习文史	23
张述祖	论赏罚	12
张东荪	我亦追论宪政及文化诊断	7
	敬答樊弘先生	16
	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	23
梁漱溟	预告选灾追论宪政	4·5
	略论中国政治问题	14
许德珩	魏德迈回国后美国将如何的对中国?	1
费 青	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问答	1
费孝通	论绅士	1
	欧洲仲夏夜之梦	2
	如是他见	3
	论知识阶级	8
	小康经济	11
	美国之内	12
	从冷仗说起	16
	论师儒	18
	莱茵河底的魏玛阴影	18
	“只要这不是个选举年”	20
	华莱士竞选的道德意味	21
	西欧靴底烦恼处	22
	圣雄甘地	23
杨 刚	美国与德国	1

	共和国援华运动	16
杨人楩	关于“中共往何处去”？	10
杨庆堃	新大陆的余音	14
	美国和平中的火药味	23
董时进	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	11
端木正	中国能永远中立化么？	16
楼邦彦	动员·勘乱·行宪	1
	副主席的谜	5
	论这次的大选	17
	美国政制的改造	14
潘光旦	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	2
蔡壬侯	中风与芸香精	22
蔡维藩	美苏斗争的影响	22
	美苏能否相互了解	24
樊弘	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	14
	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	
刘子健	日本复兴会不会威胁中国？	
	中国应该怎样对付复兴的日本？	24
刘绪贻	知识生活的偏向	19
	风雅里的悲剧	24
刘迺诚	改革地方政治刍议	8
	国家改革之内在因素	20
刘建绪	福建农业建设的轮廓	18
郑慎山	希特勒之末日	21
钱能欣	西欧记行(一)英国	11
	西欧记行(二)法国	12
	西欧记行(三)意大利	13
钱钟书	补评英文新字词典	5
	游历者的眼睛	16
萧公权	教育的矛盾与急救的治标	13

韩德培	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	3
	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	11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15
谢南阳	日本政局	22
储安平	“为中国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	5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9
	白报纸	9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15
	论全国的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	
	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16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供给情形	19
	风浪·熬炼·撑住	24
	论程孟明案并论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些事情	24
戴文赛	两种日历·两种文化	24
戴镛龄	评英文新字典	4
	谈诗歌的晦涩	17
严仁赓	释“左”与“右”	7
	论反对政府	20
严绍端	印度的道路	19
罗忠恕	与爱因斯坦的谈话	20

《观察》第4卷作者索引

作者	题目	期数
丁 骥	苏联即将东顾	19
方秋苇	评南京中央日报对王芸生的攻击	22
王铁崖	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11
史 靖	绅权的继替	17
田心源	华莱士晤见记	12
田汝康	美援与英国外交	7

	一个英国乡村时事讨论会旁听记	15
	英国人看中国	19
江 沙	在菏泽解放区所见	2·3
全慰天	孩子·乳头·工作	8
沙 平	退伍	21
汪 铭	殇	21
吴 晗	论皇权	6
	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	14
吴世昌	悼许季弗先生	6
吴伯渊	谈家庭津贴制度	13
吴恩裕	社会契约论	12
	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密尔自传书后	19
吴国钧	向全国的父母亲们哭诉	12
吴瀛麋	英方在康藏边区筑路	20
余才友	谈今天的学生	9
	马约翰的体育	15
何永信	世界之两极	1
	钱面前的平等	10
	论中国式的代议制度	11
	马克思的私生子	12
	生意经与外交	16
何孝达	学生是怎样吃饭的	11
	在我们的“大海船”上	14
	我们眼中的工友变了	15
李纯青	论反扶日	16
李浩培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和平	7
林志纯	科举选举与中国式的民主	13
周东郊	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兼论	
	我们的道路	13
周炳林	虽然对立,不见得就有战争	1

季羨林	论聘外国教授	3
	忠告社民党和青年党	13
金轮海	文字改革的实验	14
夏炎德	改革币制有办法吗?	19
胡为柏	内战给予工矿事业的摧残	5
胡庆均	恋爱·婚姻·家庭	18
	费孝通及其研究工作	24
段连城	战云弥漫下的美国	8
	美国大选点将录	10
施复亮	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	4
	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	21
凌卓	包华丽夫人逝世一百年	6
	甘地与罗曼·罗兰会谈详记	10·11
徐中玉	契诃夫断想	5
	诗家妙处	14
陆志韦	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	9
陆君平	时局问答	21
孙克宽	重演历史? 创造历史?	8
	小康之局如何实现	24
袁昌英	一颗微妙的心	7
袁翰青	原子能与世界和平	15
	三十年来中国科学的检讨	12
陈振汉	国民所得	1
陈梦家	敬悼甘地先生	3
张西曼	历史回忆片断	22
张东荪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1
	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	2
张述祖	论神秘的思想——神秘的逻辑	6
	无病之病	12
张培刚	从“新经济学”谈到凯恩斯和马克思	15

莫如俭	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	20
郭叔壬	宪政和中国文化	3
笄移今	论当前的土地问题	6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	18
	物价涨风的新阶段	20
	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情势	24
许德珩	“五四”二十九周年	11
曹觉民	论神境	3
费孝通	关于“日本复兴会不会威胁中国”	1
	巴力门·电影业·中国出路	2
	关于“乡土工业”和“绅权”	4
	拆炉话北美	5
	郑兆良和积铁	7
	再论美国大选	9
	读赫尔回忆录	12
	和平之谜	14
	杜威入选与对华政策	19
	两分三裂的民主党	22
杨 刚	总统的灾难	4
杨 绛	听话的艺术	8
杨人楩	内战论	4
杨庆堃	俨然又是第三个暴风雨的前夕	6
叶君健	东欧·西欧与新的战争	14
	南欧与北欧	21
楼邦彦	如何能粉饰得了太平	5
	两个共和之间的法兰西	9
	论动员战乱时期临时条款	10
	论教育部两个代电	15
	论“公然反对政府”	22
樊 弘	只有两条路	7

	关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18
齐 星	辩论	20
刘子健	大圈子里小圈子的日本政局	2
	辩“日本复兴问题”	9
	“美国与中国”	17
刘绪贻	狭路相逢	5
	两种克服自然的知识活动及其冲突	10
	人性的抑郁与了解	1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6
	退无以守·进必以战	19
	锦上添花的代价	24
刘涤源	物价狂涨！物价狂涨！	18
刘郝稼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	24
刘学潜	汉字的改革	16
潘光旦	读“自由主义宣言”	3
	梦魇的觉醒？	7
	悼柏蒂也夫教授	20
郑慎山	释“Liberal.Liberalism”	6
钱克新	评对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	2
钱歌川	大战时期的美国文学	13
钱钟书	杂言	2
戴镛龄	故国风光	4
戴文赛	原子时代第三年	8
	许勇三的音乐	9
	三月九日观测日月食	11
严仁赓	社会主义乎？新资本主义乎？	17
	再谈“新资本主义”	24
严绍端	甘地与新印度	1
	甘地之死	1
龙正大	一个大学毕业生对于大学教育的意见	17

储安平	国大评论	9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10
	评翁文灏内阁	15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20
	吃重·苦斗·尽心	24
简贯三	再为征用国外资产呼吁	16
蓝浦珍	玛瑙戒指	15
谭崇台	论日本赔偿问题	17
萧乾	拟J·马萨里克遗书	7
罗坚白	平抑物价乎 管制收益乎	24

《观察》第5卷作者索引

作者	题目	期数
王璧岑	从战前标准看公教人员	8
王渡之	孙内阁的五大彷徨	18
王了一	漫谈方言文学	11
叶君健	波兰之行(上)	6
	波兰之行(下)	7
刘大中	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	4
刘涤源	论物价的局部管制	6
	百孔千疮的物价管制	10
	论金币制造与修正	14
刘大杰	教育与政治	8
	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	15
刘绪贻	狂澜	17
	知识·生活·宇宙	3
	道德的眼镜	7
	工业化的利弊	10
	长指甲里藏着什么	16

方秋苇	张群访日之行	4
何永佶	中国在联合国中	10
	杜鲁门的胜利就是华莱士的胜利	14
李翰如	以“积点剩”及“服务记录”解决用人	11
李有义	西藏商务考察团之谜	16
李中严	社会出路与人类前途	4
李广田	最完整的人格	2
李长之	评李广田的《引力》	5
李超	从妇女运动看妇女问题	8
张志让	评全国学生被捕事	4
张申府	呼吁和平	9
张东荪	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	11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	1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	2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	3
张振鹜	联合国大会怎样工作	5
汪铭	逃亡	6
严仁赓	政治力量安能稳定物价	6
	1848~1948 历史的两个转折点	18
严绍端	海德拉巴·印度的问题·土邦	8
严中平	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7
杨人榷	科学精神与民主态度	6
	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	8
	再论内战	9
杨庆堃	杜鲁门胜利的分析	12
林海	《围城》与 Tom Jones	14
吕玉文	韦伯夫人的《我俩的伴侣生活》	8
吴晗	悼朱佩玄先生	1
范泉	人像	18
邵燕祥	币	15

宗白华	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4
沈宗征	何其芳的转变	2
曾玺发	投考	3
昶 明	在牢狱中	13
周维明	马的故事	9
鲁 忍	看守所	7
郭绍虞	谈方言文学	5
陆志韦	燕京被搜在场谈话	2
赵超构	论政府大捕学生	2
楼邦彦	国法与校章之间	3
费孝通	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1
	铁幕安在	10
	美国在华还能做些什么	14
	英国并未忘情远东	17
樊 弘	金圆券能稳定物价吗?	1
	传统的经济学说何以竟成了阻碍	
	中国进步的绊脚石	5
	关于传统经济学的总答辩	15
潘光旦	从几个世运选手拒绝回国说起	2
	妇女问题的一个总答复	3
	工业化与人格	7
	读书的自由	16
程子汶	美援究竟能帮多少忙?	7
笄移今	限价解除危机依旧	11
谭崇台	“生产因素四分法”与革命	15
施复亮	论当前的经济等情形	10
	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12
储安平	一场烂污	11
	政治失常	13
徐毓柵	币制改革与物价前途	14

	两次币制改革中之技术错误	17
	经济学人与经济方案	13
徐道邻	论现行法律教育制度	3
季振平	我主张中学不要教文言文	7
夏 鼐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	14
董时进	和真比战难吗?	15
全慰天	贫穷与贫穷问题	15
陈仁炳	论政治变动	17
陈志让	原子能与世界大局	12
段连城	“红帽子”在美国	2
朱若华	悼贝纳斯	5
	举世瞩目的柏林问题	9
	英国整军及其影响	13
萧 乾	托洽:联合国的试金石	5
罗志如	远东马歇尔计划	9
凌 卓	“法意”出版二百年	11
蒋学模	美苏关系的现在和将来	18
吴景超	从四种观点论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	13
黄碧遥	读潘光旦先生妇女问题的论文之后	8
罗 素	狂妄为什么会招致失败?	11
The New Statesman	德国问题的症结	1
	印度独立一年	3
Arnoid Toynbee	文明在生死之间	2
William Winler	被牵着线的独立国——菲律宾	4
Kingsley Martin	老持沉重——英国的政治风度	4
Smith	朝气蓬勃的华莱士进步党	5
Mark Gayn	激速转舵下的美国对日政策	6
Thomas Cadett	法国的磨难和危机	12
Aldous Haxloy	一个面临毁灭的世界	17

《观察》第6卷作者索引

作者	题目	期数
子冈	莫斯科所见	2
	苏联的戏	5
之钟	这一代青年生长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	5
于夫	苏联劳动英雄乌巴伊杜拉耶娃	8
千家驹	从共同纲领看私营企业政策	3
王铁崖	新政府的成立和旧条约的审查	2
王鸿	战胜今年的春荒	7
王瑶	考据学的再估价	9
王泗原	新的中学国文课本该怎样编?	7
王亚南	论革命与科学的统一	5
王小石	解放以后的江南农村	3
王政论	东北春耕以前的备耕工作	12
王宗炎	广州中山大学的新生	9
江横	京汉道上	12
汪圻	从北京到长安	14
田欣	记南京大学的课程改革运动	10
	南京大学政治学习的情况	12
李有义	封建统治下的西藏	10
李何林	提供许寿裳先生两年前在台被杀 是政治性暗杀的种种事实	8
李子英	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的自述	9
朱契	论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	14
陈体强	中苏新约——国际主义的教科书	9
陈治文	论中学国文课本	10
陈达	全国人口选样调查的计划	5
陈振汉	土改教育了我	11

陈本中	湖南邵阳的减租斗争	11
陈楚熊	记上海游民的收容改造	7
	上海在反轰炸斗争中	11
	三十一年来在战斗中成长的上海	
	职工运动的总回顾	5
陈醒民	许寿裳案的审判人对于李何林文的补充	10
刘秋鸣	记华东大学学员唐世岑的转变	5
刘涤源	人民币的管理本位	8
钱端升	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	1
储安平	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2
	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	4
	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	5
龚祥瑞	中央各部会内部组织的原则与方式	1
	论中央二级机关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3
	民主集中与三权分立	6
卢于道	政治热忱与科学热忱	4
卢耀武	将军与青年(记贺龙将军)	14
赵俪生	怎样理解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	14
	阐述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件史料	13
楼邦彦	论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	4
季羨林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3
芮沐	新婚姻法建立了新的男女关系	13
翁独健	世界和平与中苏友好关系	1
潘光旦	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讲	14
潘静远	亚澳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3
易梦虹	美国未成年劳动者的失业问题	13
瞿宁武	论苏联提高卢布官定兑	
	率及降低国营贸易物价	10
笄移今	人民币的战斗任务	4
	从卢布金比看中国黄金问题	11

吴景超	谁知道中国的资源	10
吴大琨	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习提高到毛泽东阶段	1
张白记	大西北的中国资源	11
张佑瑜	清除掉我的官僚主义作风	14
张高峰	记去年一年天津公私银行怎样扶助私营工业	7
张云横	中学国文教学的研讨	12
郑伯彬	解放以来中国工业的转变和今后的工业问题	7
	论物价稳定后工业经营遭遇的新困难 及其克服道路	3
施建	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	11
高名凯	论文字改革与语言改革	5
高超	劳动先锋马星祥谈 1950 年大生产	11
杨振声	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	13
周河冬	编选中学国文课本的几个实际问题和改进意见	14
黄开丹	一个工学院学生对于工学院教学的几点意见	10
黄国宪	清华怎样进行人民助学金的评奖工作	6
沈志远	革命人生观的几个基本观点	9
陶孟和	科学在新时代里	8
陶大镛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8
竺可桢	近代科学推翻了马尔萨斯人口论	12
茅冥家	为什么要先打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12
胡绳	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	1
胡冰	论松江省的农村副业生产工作	13
焦孟甫	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6
樊弘	从经济上考查中苏三大公司的协定 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	14 1
樊骏	北大同学是怎样搞膳团的?	11
费孝通	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	2
	什么叫搞通了思想	6
	不改造就落后	7

	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	9
	从“为人民服务”引起的谈话	10
	进步的包袱	12
谢逢我	我的思想总结	8
	清华是怎样进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	13
云映海	挖出我的思想根源	13
阿·郭济克	波兰五年来国民经济的复兴与发展	6
斯杰班诺夫	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	7
薛谋洪	在胡志明旗帜下的越南	8
吕德润	法国妇运领袖维尔米什访问记	6
孙执中	华罗庚教授回到了祖国	12
	北京妓女改造的前后访问	6
孙如冰	京郊土改实验区巴沟村访问记	3
	记表现旅大人民生产力量的大连工展	2
徐盈	李四光教授及其在地质学上的成就	13
叶君健	我所见的英国	7
	走过北欧	14
许世玮	读李陈关于我父许寿裳在台被杀 是政治性暗杀二文后	12
许诚	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验	10
金玉黼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	13
郭沫若	我向你高呼万岁	4
贺笠	上海散记	14
林维仁	工业化的经济建设在号召着 新中国的青年奔向东北	14
郢瑞·白盘	在生产救灾战线上的苏北 把灾区变成人民的谷仓	10 14
思雪	四川解放以后的农村工作	11
穆家军	记河南农村的土地改革	13
萧玉之	记东北的伐木工作	10

萧 风	记 1950 年度新中国教育工作的重点	6
	迎接文化高潮的信号——记最近北京演出的几个大戏	11
萧 离	察北一村落	14
君 羊	清华学生进行思想总结的典型意义、 经过情况和胜利收获	9
彭越明	北京大学一年来的改革和学习	8
贝 加	记浙江大学的工读互助运动	12
袁翰青	举办了一次新兴展览会的经验	13
左步青	上海科学工作者的新方向	13
曹锡珍	记上海解放后肃清特务、盗匪、偷窃 以及救火的工作	8

储安平著作单行本目录

储安平编《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政论集),新月书店,1931年,上海。

储安平著《说谎者》(小说集),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

储安平著《给弟弟们的信》(散文集),1936年,开明书店,北平。

储安平著《英国与印度》(专著),1943年,科学书店,桂林。

储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国人》(专著),上海观察社,1948年,上海。

储安平著《英国采风录》(专著),上海观察社,1948年,上海。

储安平著《玛纳斯河垦区》(散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北京。

储安平著《新疆新面貌》(散文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北京。

批判储安平言论专集目录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光明日报社印刷，1957年，北京。

《〈观察〉储安平言论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工人日报社印刷，1957年，北京。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光明日报社印刷，1957年，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1. 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南京。
2. 邓加荣《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北京。
3.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4.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
5. 储安平编《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新月书店，1931年，上海。
6. 储安平《说谎者》影印本，良友出版公司，1992年，上海。
7. 陈纪滢《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台北。
8. 孙陵《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成文出版社，1991年，台北。
9.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济南。
10. 《编辑记者100人》，学林出版社，上海。
1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香港。
12.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台北。
13.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14. 李杜《常芝青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太原。
15. 《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16. 林元《碎布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北京。
17.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北京。
18. 《光明日报四十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北京。
19.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20. 《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济南。
21. 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天津。
22. 《张申府散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北京。
23. 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重庆。
24. 艾恺著《梁漱溟传》中译本第290页，湖南出版社，1988年，长沙。

25. 《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上海。
26.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北京。
27. 《巴金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
28. 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北京。
29.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北京。
30. 《胡适的日记》第12册、第16册，1985年，远流出版公司，台北。
31.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北京。
32. 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0年，北京。
33.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北京。
34.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南京。
35. 徐铸成《风雨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杭州。
36. 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北京。
37. 《钱钟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北京。
38. 杨绛《干校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
39. 平野正《储安平立场与〈观察〉杂志的性格》，日本西南大学《文理论集》第24卷第2号，1984年，东京。
40. 胡素珊（美）《中国的内战》（王海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北京。

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在1993年完成的。其中的主要部分曾收入《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这次单独印出，我在原稿基础上作了较多删除（主要是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国内关于《观察》周刊的研究还很少，材料也不易得到。过了十几年，相关的研究已很丰富。作为较早对这本周刊的研究，这本小书曾起过一点作用。今天单独印出，更多具有的是纪念意义和在材料方面的线索。

感谢韩勃兄的关照，是他在十几年后还记得我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给了我这次难得的机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所长，为我提供了一年在北京访学的机会，使我有较多时间修改这本旧作，感激之情难以言说。友情比书重。

作者

2005年5月19日于北京访学期间